



济南党史研究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ZHONG
GONG
JINAN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IAN



2008

总第37辑
第一辑



济南党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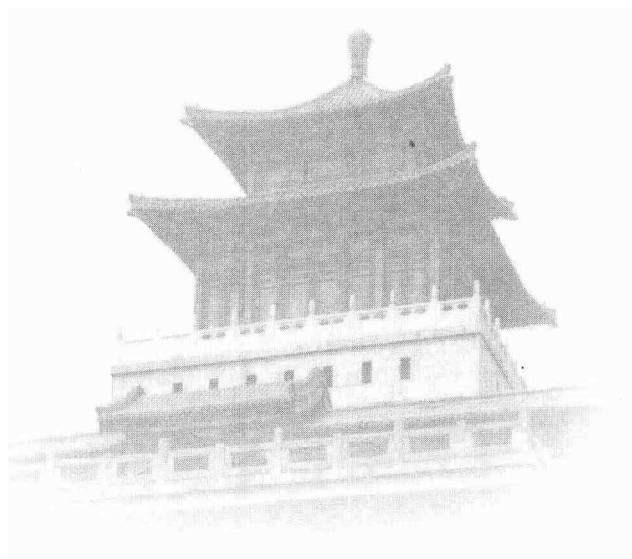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ZHONG
GONG
JINANSHIWEI
DANGSHI
YANJIUSHI
BIAN

责任编辑 赵百世 张文 封面设计 侯文英

济南党史研究

2008年第一辑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2008年5月

济南党史研究

2008 年第一辑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山东新华印刷厂 印刷

济南世同苹果图文有限公司 设计制作

898×1194 毫米 1/32 5 印张 字数:130 千字

2008 年 5 月印刷 1-1000 册

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

2008 年济南第 7 号



目 录

目 录

工作指南

-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进一步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 李景田(1)
发挥党史工作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龙新民(16)

专题研究

- 济南市的“三反”、“五反”运动 (22)
文革中济南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李希和(37)
历下区解放初期至 70 年代婚姻法的贯彻落实 (47)
历下区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1949~1978) (53)

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同志诞辰 110 周年

- 周恩来同志与王祝晨先生的情谊 王 恒(59)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 (75)

纪念王尽美同志诞辰 110 周年

- 臧克家心目中的王尽美 乔植英(81)

纪念平阴解放 60 周年

铭记历史 继往开来

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新平阴 孙积港(87)

回忆录

和谦初一起在济南 张文秋(91)

纪实

50 年前济南市委办公大楼建设纪实 王子侠(102)

历史资料

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108)

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 (123)

年度党史工作计划

2008 年全市党史工作要点 (132)

经验交流

存史开新面 资政书新篇 历城区委党史委(136)

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

推动平阴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 平阴县委党史委(140)



光荣榜

市委党史研究室光荣榜	(146)
------------------	-------

党史信息

2007年10月以来党史工作信息	(147)
------------------------	-------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进一步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

李景田

在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热潮中,经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召开这次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总结自2006年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以来全国党史部门的工作成绩和经验,表彰十六大以来地方党史部门的优秀成果,着重研究部署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史工作,以开拓奋进的精神,进一步开创全国党史工作新局面。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好十七大精神,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大会精神上来,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大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而扎实努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全国党史部门也要把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

(一)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大高举旗帜、继往开来、求真务实,是一次团结的大



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5年的工作,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战略部署。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科学回答了我们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体现了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成果,体现了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大会选举产生的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继往开来、充满活力、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深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大会极大地统一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进一步树立了我们党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形象。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振奋精神,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国各级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一定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重



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要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织的学习,同时以多种形式组织好党史部门内部的学习,确保党史部门的学习热潮持续、深入地向前发展。通过学习贯彻,把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七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二)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十七大的主要精神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首先要认真研读十七大文件,原原本本地学习十七大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十七大的主要精神,真正把十七大的精神理解好、掌握好、贯彻好。

十七大主题是十七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个主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十七大主题进一步明确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旗帜、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各族人民的新期待,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七大的主题,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主题。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在深刻领会大会主题上下功夫。

围绕十七大主题,要着重学习、领会和把握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精神。

第一,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贯穿十七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十七大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各方共识,郑重宣告高举中国特色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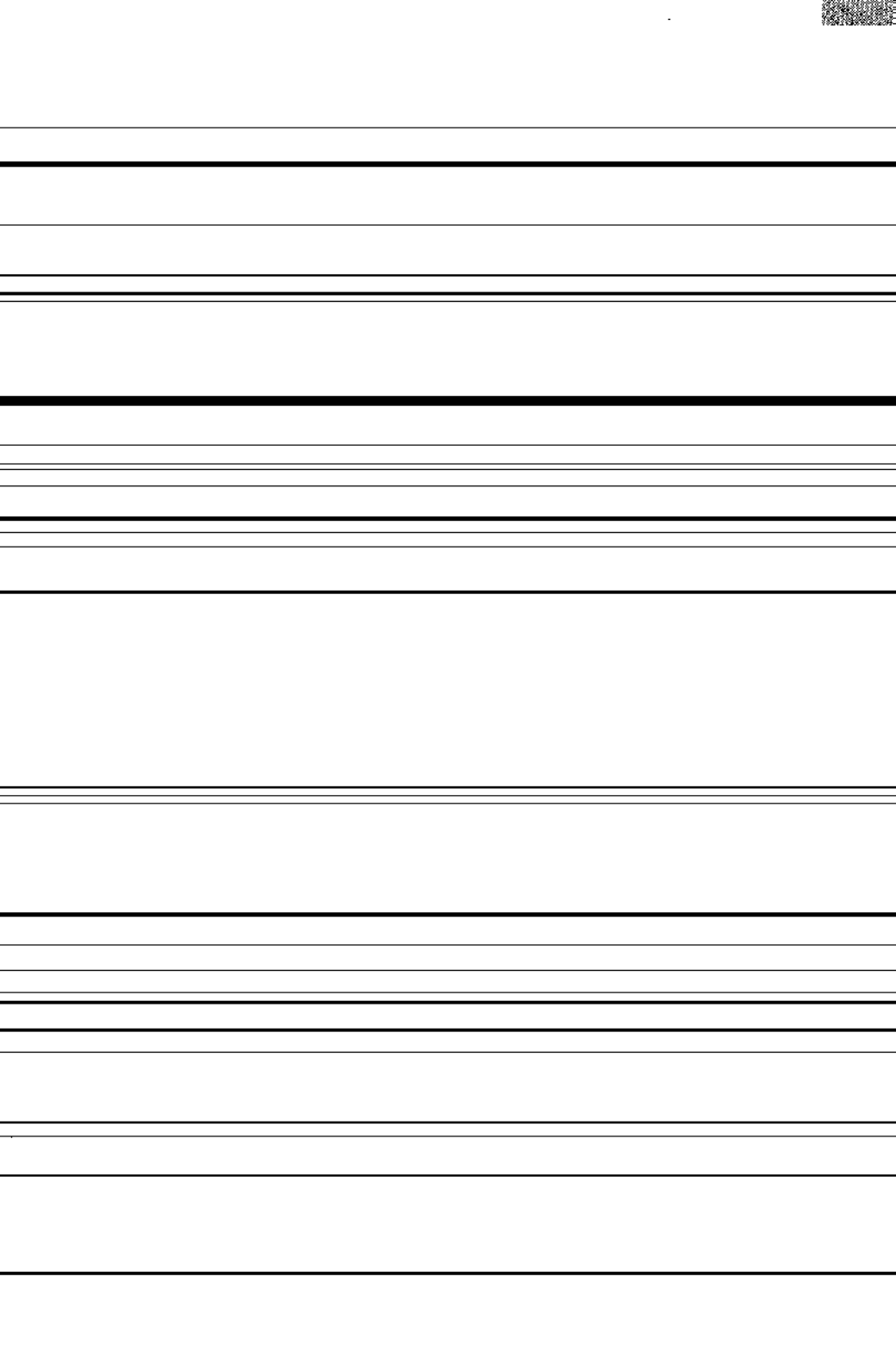
会主义伟大旗帜,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旗帜问题历来是我们党发展前进的重大问题。十七大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的伟大创造和正确选择。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一再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要在实践基础上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第二,要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

十七大报告全面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提出三个“永远铭记”,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报告强调,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十七大报告用十个“结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党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宝贵经验的最新概括。总结这些宝贵经验,对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



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大会作出的这些重大部署,表明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了更加科学的把握。将这些部署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不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第五,要深刻领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我们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为在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党的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指明了方向。

十七大报告还要求全党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这四个“一定要”,振聋发聩,令人深思,催人奋进,是面对复杂环境和严峻挑战、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



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这四个“一定要”的要求,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万众一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三)结合党史部门实际,认真抓好十七大精神的学习贯彻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培训的首要政治任务。十七大一闭幕,我们就向全国党史部门发出了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通知,同时以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名义联合召开了党史界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座谈会。各地党史研究室也召开了学习座谈会。各级党史部门务必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的要求,切实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认真研读学习十七大文件。要区分不同层次,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列出专题进行研讨,通过理论中心组和各种形式的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把机关内部的学习抓紧、抓实、抓好。要原原本本学习十七大报告,围绕中央《通知》中提出的要求,既要从总体上把握和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又要系统钻研和理解其中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还要学习贯穿报告全篇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原原本本学习党章修正案,自觉做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要通过深入学习,真正把各级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把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到党史工作中去,进一步增强做好党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际行动推动全国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坚持以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着眼于更好地实现党史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发挥党史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分析研究十七大对党史工作的新要求,联系党史部门的工作实际,联系广大党史工作者的思想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要通过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使党史部门和广大党史工作者努力做到:更加坚定不移地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党史工作科学发展,全面提高党史研究、党史资料征编、党史教育、党史宣传、党史重要事件和人物纪念、党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等各项工作的水平;继续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保持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开创党史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解决影响和制约党史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工作方式和内部管理等问题,切实把握工作规律、创新工作理念、转变工作方式、破解工作难题,推动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教育广大党史工作者进一步改造主观世界,提高素质和水平,更加自觉地献身党史事业。

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基础上,党史部门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级党委部署、组织的十七大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党史部门的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出力献策。要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党委交给的有关宣讲、编写宣传材料等方面的任务。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发挥党史部门优势,突出党史特色,利用党史部门资料、人才、场馆等资源,采取组织有关报告会、学术研讨会、举办改革开放成就展览、撰写有关文章等形式,大力宣传十七大的重大意义,大力宣传十七大精神,努力使十七大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进一步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为党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也对做好党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世纪新阶段,党史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也面临新机遇新挑战。我们要以战略性思维和前瞻性眼光谋大事、谋长远、谋发展。党史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来看,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除了党史工作的基本地位、作用决定了必须加强党史工作外,新形势下还有一些突出的因素,迫切要求加强党



史工作。对此我们要格外给予关注。

一是总结历史经验,需要加强党史工作。我们党的每次党代会、中央全会,都会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十七大对改革开放的历程和经验作了深刻的回顾和总结。明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将会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所有这些,都需要党史部门加以配合,提供咨询,发挥作用。

二是开展思想教育,需要加强党史工作。近年来,围绕党史重大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对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收到了良好成效,已成为一条重要的经验。今后需要继续挖掘党史资源,发挥独特优势,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

三是纪念党史人物,需要加强党史工作。现在,纪念党史人物的任务越来越重。纪念,就要评价。树碑、立传、搞展览、拍摄电视片,答复各地及领导人家属提出的问题。如果不加强人物研究,这类问题就无法处理。

四是应对新的挑战,需要加强党史工作。敌对势力大肆污蔑我们党的历史,必须给予坚决驳斥。境外出版的涉及党史的书籍,不少内容真假莫辨,是非不明,有的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研究,避免陷于被动地位。

五是促进祖国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加强党史工作。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系列活动,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对此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加深了国共两党在民族认同上的感情。利用党史资源促进国共合作、增强民族认同,这可能是一条新的经验。在这方面还可以继续探索,适当地做一些工作。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发展,都迫切要求更加充分地发挥党史工作的作用。各级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一定要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做好以党史研究为重点的各项党史工作,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更好地肩负起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光荣使命,推动党史工作的全面发展和党史部门的全面建



设,进一步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党史工作的新局面。

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需要我们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特别是要进一步增强三个意识:

一是进一步增强旗帜意识。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旗帜是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的根本标志,是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展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十七大的重大决策,也是全党包括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在党史工作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努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贡献。要进一步明确党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党史工作。要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更加深刻地揭示历史规律,更好地实现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要从党史部门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解决事关党史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转变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扎实做好工作,推动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之后,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不断实践、探索、积累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历史,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紧紧围绕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党史研究、宣传、教育和其他有关党史工作。切实把党史工作的重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到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来。既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党史

领域,创新党史工作的方式方法,运用丰富的党史资源,扩大党史工作的影响力。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努力揭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总结体现时代特点的历史经验,为党的理论创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及时有效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要提高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能力,不断开拓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成果,开创新局面。

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全面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史工作

2008年和今后几年,是党和国家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关键时期,是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党史部门落实2006年至2010年五年规划、发展党史工作大好局面、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时期。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以党史工作五年规划为框架和基础,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线,切实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党史工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党史部门要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的研究和有关工作

各级党史部门,要把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作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任务。要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的实践,结合明年将要开展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确定一批重点课题。把十七大与历史有关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纳入党史研究的范围,从历史的角度阐明其客观依据,加深对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理解和认识。切实把深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研究作为重点,加强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程和经验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

度;在继续深入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史资料的同时,重点征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资料,继续做好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口述史料等专题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继续做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的编译工作。

党史宣传教育方面,要做好与有关部门共同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大型展览,以及拍摄党史影视片的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百年潮》杂志,各地的党史刊物,都要做好宣传十七大精神和改革开放 30 年成就的工作。

党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方面,各级党史部门都要积极参与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地、纪念场馆的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指导等工作。对党代会和中共中央机关遗址的建设和保护工作要继续推进,争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要组织开展对全国革命遗址遗迹的普查。

(四)继续做好业务指导和力量整合,加强地方党史工作的协调和配合

上级党史部门要继续通过研究有关方针政策、制定工作规划、通报有关情况、开展学术研究和课题合作、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培训干部等方式和途径,加强对地方党史部门的业务指导。要继续推进跨省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还要根据需要,组织开展其他课题的协作研究。要加大“开门办史”的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发挥党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加强协作,集中攻关,推动全国党史事业发展。各省级党史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党史部门的业务指导,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发挥市、县党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共同推进党史工作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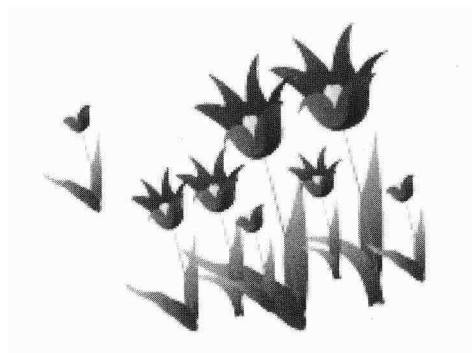
(五)进一步加强党史部门队伍建设

从党史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以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为目标,努力建设一支与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党史工作队伍,是事关党史工作全局的大问题。要根据十七大精神,加强党史



部门自身建设,努力建设和谐机关,不断加大对干部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的力度,建立广纳群贤、人尽其才、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培育党史部门的良好作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史队伍。要引导和鼓励广大党史工作者以党史事业为己任,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立足本职、建功立业。要通过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和奖励约束机制,激发、保护党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大家的工作、成才和内外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本文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于2007年12月9日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发挥党史工作 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龙新民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这是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人民需要所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时代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的科学把握,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我国总体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之后,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愈加强烈。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高度,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出发,扎扎实实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不单纯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情,也是全党的任务,是社会各方面的共同责任。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角度讲,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党史研究工作中,要更加紧紧围绕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建设的任务,有所作为,多作贡献,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一、党史的研究和编纂出版,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修史对于了解制度的变化、传承文明、资政育人具有重要作用。司马迁写的《史记》,是第一部翔实的通史,写出了西汉中期以前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为“二十四史”的前驱,



是传承文明的不朽丰碑。到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时,经乾隆皇帝钦定,以历朝 24 种纪传体史书为“正史”,也就是“二十四史”。中国古代史书之渊源久远,卷帙浩繁,体裁完备,史料齐全,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独树一帜。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我国修史构成了一种深厚的民族传统。史官、史书、史法和以历史为借鉴的“史鉴”,既记载了历史,传承了文化,也沟通了过去和现在,连接着将来。“国有史,方有志”,历朝历代,修史修志都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修史修志工作,党史的研究和编纂出版一直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特别是 1980 年后,中央决定成立了由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党史编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和编写工作。1988 年,中央又决定组建了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直属中央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部门。党史研究机构一直延伸到省、市、县三级党委。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80 多年的奋斗、求索,开拓出今天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发展成为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深受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党的光辉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回顾、总结、研究、编写、宣传,无疑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应当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只有组织编纂出版好、学习宣传好中共党史,使之引领当代,传之后世,才能做到永远铭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永远铭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 21 世纪的卓越贡献,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胜利推向前进。

二、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报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无论是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是从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角度,党的光辉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都是最生动的教材,最宝贵的资源。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没有党带领人民在80多年的奋斗中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和谱写的壮丽史诗,没有党带领人民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取得巨大成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难以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可以说,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8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艰苦奋斗,书写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涌现出无数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创造和培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涌现了像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杨靖宇、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江姐等无数革命先烈和战斗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又形成了“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产生了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钱三强、邓稼先、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宋鱼水等一大批英模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体现在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集中起来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不畏困难，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奋进，创新发展。这些品格和精神，是同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抑恶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一脉相承的，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努力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和弘扬革命先辈与英雄模范的伟大精神及崇高品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这几年，中央有关部门举办的《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伟大壮举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复兴之路》等以党史、军史题材为内容的大型主题展览，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以党史纪念地为主的红色旅游十分火爆，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央各新闻媒体连续几年开办的《永远的丰碑》、《时代先锋》、《红色记忆》等以党史和英模人物为题材的专栏、专题节目，也为广大干部群众所喜爱。人们从党的光荣传统中，从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身上，学到了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动力。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党史研究、编纂、出版、宣传工作所

包含的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党史工作所要承载的光荣使命。

三、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主旋律,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在 80 多年的奋斗中走过的艰难历程,所创造的光辉业绩,所谱写的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是孕育中国先进文化的摇篮和沃土,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党的光辉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不胜枚举。1964 年创排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一部歌颂党的奋斗历程的艺术精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反响。《开天辟地》、《南昌起义》、《走近毛泽东》、《井冈山》、《闪闪的红星》、《长征》、《青春之歌》、《八路军》、《西安事变》、《南征北战》、《林海雪原》、《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国大典》等一大批文学、电影、电视剧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表现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讴歌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成为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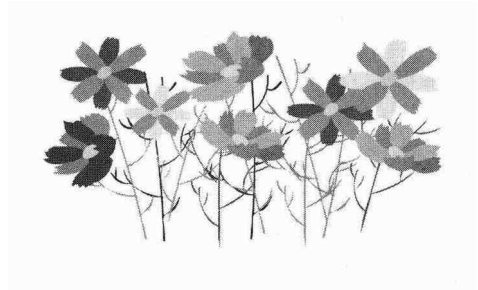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现代中国最绚烂、最辉煌的历史。以党的历史、党的领袖人物和党



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先进模范人物为主题的文学艺术、影视作品,构成了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也成为各个时期作家艺术家浓墨重彩进行创作的主要方面,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04年9月,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向社会推荐了100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我粗略计算,这100部影片中,同党史题材有关的电影就达54部,占一半以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史题材在文艺创作中的特殊分量和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值得作家艺术家们去反映的事件,去讴歌的人物,去揭示的生活,去表现的题材,去书写的华章巨篇,是无穷无尽的。这是文艺工作者可以纵横驰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也是党史研究工作围绕文化建设多作贡献的重要舞台。用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把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记录下来、传播开去,必将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求是》2008年第2期,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济南市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2月6日到10日,在短短4天时间里,毛泽东主席接连两次批示了济南市委关于“三反”、“五反”斗争的报告,充分肯定了济南市的“三反”、“五反”运动,高度赞扬了济南市委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在毛泽东主席批示的鼓舞下,济南市委按照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深入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济南市“三反”、“五反”运动的源起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庄严号召:“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然而,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这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警觉。

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1月29日,华北局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主要负责人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这更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



斗争来处理。”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2月8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自此,正式拉开了全国规模的“三反”斗争的序幕。

济南市解放后,市委领导全市人民开始了城市接管、改造与建设工作。面临着地位、任务、环境的变化,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英雄本色,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但也有部分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贪污蜕化;部分留用职员和新参加工作人员,因未经过很好的教育改造,仍保留了浓厚的旧思想旧作风;同时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对城市工作还缺乏经验,加之领导机关监督不够,制度不严,因而产生了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据解放后三年来,经市人民法院、人民检查委员会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已受理的案件统计,犯有贪污行为的工作人员即有276人。其中,1949年64人,1950年89人,1951年123人,贪污总额16亿余元(旧币)。至于因贪污渎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难计量,仅工业局一案因贪污受贿、勾结私商高价买货走私漏税等,就使国家损失7亿余元。在276名贪污分子中,党员69人,非党员207名;留用和新吸收的人员208名,老干部68人。铺张浪费则是普遍的,仅市属各财经单位一年来即达11亿余元。领导机关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因此,开展“三反”斗争,清除“三害”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山东分局关于增产节约、整顿机关的指示,及贯彻济南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市委

于1951年11月13日,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由市委书记谷牧作“全党动员起来,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贯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而奋斗”的动员报告。号召全市党员立即行动起来,团结各界人民群众,以最快的速度 with 最大可能,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同时成立市级机关整编节约委员会;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分别召开公营、私营企业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增产节约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停止一切浪费现象。

12月3日,市委再次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市委书记谷牧作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报告,市委组织部蒋方宇对全市开展这一斗争作了具体部署与安排。至此,“三反”斗争在全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济南市的“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中,为了打击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开展起来的。随着“三反”运动的发展,暴露出机关、企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贪污盗窃行为绝大多数都是和私商相勾结,狼狈为奸形成的,而不同程度的非法行贿,又是工商业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一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站在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立场上,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大肆实施“五毒”,猖狂向党和政府及国营企业进攻,严重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工商业者行贿的方法是多样的:勾结贪污分子,盗窃国家资财;在加工订货中偷工减料,或增加费用;对公家物资贱买贵卖,或贱买了又贵卖给公家;盗窃经济情报,偷机倒把;在工程中高价承包,偷工减料;行贿收买税务人员,走私漏税;内外勾结,偷盗公款,私作买卖;以回扣和造假单据进行收买。还有的以入股提成、介绍爱人、姘头,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老婆、女儿等卑劣手段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很显然,这一切犯法行为都是以盗窃国家资财,图牟非法暴利为目的。这必须同贪污分子一样,彻底给以揭发和纠正,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1951年12月下旬,市委为了配合全市的“三反”运动,在全市工商界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诈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 and



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自此,济南市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暴利、反偷漏、反欺诈的“四反”运动正式转入“五反”运动。

二、济南市“三反”运动

济南市的“三反”运动于1951年12月初开始,至1952年6月结束。全市机关、工厂企业干部职工17137人参加了运动。整个运动分为民主检查领导、普遍反贪污、打虎斗争、定案追赃处理与思想组织建设四个阶段。

(一)民主检查领导阶段 运动初期,主要限于普遍揭发铺张浪费与官僚主义的现象,特别集中于民主检查领导。12月3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市委书记谷牧作动员报告,号召全市党员干部行动起来,深入贯彻整编节约增产节约,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开展斗争。然后,各单位分别逐级传达,组织干部学习讨论,接着各单位领导结合本单位实际,分别作了动员检查报告。17日,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委员会联合举行第一次扩大联席会议,作出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三反”斗争的决定。市委书记、市长谷牧讲话,号召全市各界人民积极负责地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给人民政府以有力的协助。为了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市委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谷牧任主任,下设4个办公室,组成4个检查小组,深入各单位进行检查。同时成立市委、市府、财委、公安等11个分会,64个支会。各分、支会均设立专门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全市宣传员亦动员起来,广泛展开宣传,充分发动群众。工商界举行了动员大会。经过反复动员和学习文件,结合座谈讨论,联系思想实际克服了错误思想和顾虑,提高了对“三反”的认识,初步揭露了贪污浪

费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27日,市委关于“三反”的报告上报山东分局、华东局和中央,报告列举了各行各业暴露出来的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说明开展“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围剿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表示了市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28日,山东分局及时批示“济南市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向分局并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济南市仅仅经过了初步的检查,即已发现了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这就更加证明了中央指示我们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这一运动有极为重大意义。希望各地党委都以最大的决心与力量,按照中央指示与分局十二月扩大会议精神及历次指示,迅即有领导地大胆放手地开展这一运动,使之取得预期的效果。根据中央和分局的指示精神,市委进一步强调领导负责,层层带头,发动群众,讲清政策,并及时撤换压制民主或手脚不干净拒不交待问题的领导人,运动迅速转入反贪污斗争。

(二)普遍反贪污阶段 1952年1月,是反贪污斗争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全面展开的阶段。市精简节约委员会组织各部门认真学习毛泽东元旦献辞和薄一波的动员报告,统一了思想认识。全市连续召开坦白大会,号召普遍坦白检举。并于13、14日两天分别召开店员、手工业工人代表会议,发动广大工人、店员协助检举贪污行贿分子。5日,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谷牧作工作报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象过去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样,象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一样,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下来的丑恶污毒,彻底予以根除。会议通过《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决议》。市精简节约委员会根据市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三反”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对贪污分子发动内外夹击、四面围剿的攻势。17日,全市召开工商界1.7万人的大会,动员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暴利、反欺诈运动,对工商界限七天一次坦白彻底。市精简委员会抽调各机关、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60多人



组成10个检查组,有重点地分赴各行业进行检查。与此同时,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除省市机关150余名报告员、全市2500余名宣传员广泛向各界人民进行宣传外,还有本市各中学生、教员及工人业余学校教员等450人组成18个宣传大队分头深入到店员中、私营工厂中、工商界各行业、街道进行宣传,以便做到家喻户晓。这样“三反”运动不但在各机关团体内部达到高潮,而且在外部亦有了广泛的发动,据不完全统计,至20日止,市精简委员会已收到检举坦白的信件共3000余件,一批贪污分子纷纷交待了问题。暴露了贪污现象十分严重,如工商局所属各专业公司通过揭发坦白,发现184名人员有贪污行为,占总人数的11%强;市建设局163名人员中,发现贪污分子60人;工厂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及采购部门贪污受贿现象也是极其普遍的。贪污分子贪污手法极其多样:贪赃受贿、吃回扣、走私漏税、泄漏商情、与私商合伙投机倒把、公私不分挪用公款、低价出售、高价买进、纵容私商偷工减料等,手段恶劣,行为卑鄙,触目惊心。

(三)追击围剿全力“打虎”阶段 全市集中火力猛攻大贪污分子的斗争是在普遍坦白检举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打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至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战斗整整进行了两个月,经过两次打虎战役,各单位先后于3月底结束。

1月29日,市委召开全市主要干部活动积极分子会议,全面部署了打“老虎”的战斗任务,初步作出打“老虎”的预算。按照市委部署,各单位成立“打虎”指挥部,组织了精干“打虎”队伍。

2月6日,毛泽东主席对济南市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作了批示:“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请转各大城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充分肯定了济南市的“三反”运动,更加激发了干部群众的“打虎”热忱。在首长亲自上前线,带领广大群众“搜山捉虎”,四面围剿的形势下,仅一周的时间,就搜

出 28 名“大老虎”和 200 余名“小老虎”。但随着“打虎”斗争的深入,有些大“老虎”更隐蔽更狡猾,更加难打。某些干部产生了畏难松劲情绪,有的盲目蛮干,仅凭大胆怀疑,不掌握材料,轻率打起,方法简单,并带有普遍逼供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市委于 20 日研究决定采取边打边整的方针,整训领导,总结经验,改善战术,提出“攻心斗智”,严格禁止逼供,注意做好家属工作,有意识地进行劝说,打开胶着局面。到 25 日止,已捉大小“老虎”615 只,胜利完成了第一个战役 600 只的原定计划。

从 2 月 26 日开始,“打虎”进入第二战役。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第二阶段“打虎”预算 650 只(含大“老虎”110 只),要求工厂企业 3 月 15 日完成,财委系统 3 月底完成。为了打好第二战役,市委决定抽出 3 至 5 天时间分批休整,主要是总结经验,加强领导,研究敌情,确定具体“打虎”对象,制定第二战役的计划,清理积案,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整编队伍,处理“俘虏”。3 月 10 日,省、市机关联合举行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1.3 万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进一步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当场逮捕拒不交待的大贪污分子董某,从宽处理彻底坦白交待的大贪污分子段某等 4 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28 名大贪污分子当场坦白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同时,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规定,在政策上紧紧掌握严肃与宽大,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精神,迅速处理了一批小贪污分子,至 3 月 24 日,已先后处理了千万元以下及百万元以上的小贪污分子共计 2924 人,占整个小贪污分子 5063 人的 57.7%。小贪污分子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参加“打虎”阵营,推动了贪污分子继续交待问题或重新坦白,积极退赃交待。据统计,贪污分子继续坦白补充交待的有 620 人(其中“老虎”72 人),过去没有坦白而新坦白的 84 人,过去翻供,现在不翻了,而重新讲清问题的 126 人(其中“老虎”75 人),从而使顽抗的大贪污分子更加孤立。

(四)定案追赃思想组织建设阶段 从 4 月 1 日起,全市“三

23

4

8 20

补课。通过以上做法,干部和工作人员充分认识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党侵蚀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反腐蚀的必要性和反对个人主义、加强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普遍批判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思想界限,并着重揭发批判了党内长期滋长的享乐腐化思想、功臣自居、不问政治、无组织无纪律倾向以及官僚主义的思想,树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遵守纪律,力求进步的思想。在个人检讨小组通过的基础上,最后由党支部作出鉴定。

组织建设上,在清除贪污分子纯洁组织的基础上,从经过运动考验的优秀分子中提拔了干部,全市共提拔了 1075 个干部,其中,工厂企业方面被提拔的 803 人,补充了干部缺额,充实了领导;其次在思想建设的基础上,改选支部,发扬党的民主,建立正常的支部生活,健全党委制。

三、济南市的“五反”运动

济南市的“五反”运动自 1951 年 12 月下旬开始,经过宣传教育,坦白检举;重点检查,互助互查;核实定案,审判处理等几个阶段,于 1952 年 6 月结束。

(一)宣传动员坦白检举阶段 自运动开始至 1952 年 2 月 3 日,为宣传坦白检举阶段。初期,工商业者心存疑虑,表面上拥护政府号召,实际上等待观望,探听风声按兵不动。1952 年 1 月 15 日,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市长谷牧作了“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彻底肃清贪污、浪费、行贿、偷盗的非法行为的工作报告”,会议作出决议,号召全市各界人民进行检举,对工商界限期进行坦白。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成立了市工商精简节约分会。17 日,市工商联举行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反暴利、反欺诈运动动员大会。全市 1.7 万余名工商业者参加大会。市长谷牧在讲话中指出,只有彻底坦白悔过,才是犯法工商业者唯一出路。进一步号召全市工商业者打破顾虑,放下包袱,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执行市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勇敢地、大胆地坦白检举贪污、行贿、偷漏、盗骗国



STANDARD FORM NO. 6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国公约,订立“不行贿、不偷税漏税、不盗窃国家资财、不偷工减料、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不公约,努力做一个守法的工商业者。2月10日,市人民法院根据市精简节约委员会检查的结果,逮捕了拒不坦白抗拒运动的19名不法奸商,狠狠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气焰。特别是宣布对第一批重点检查118户的处理,有的逮捕法办,有的罚款,有的只退不罚,有的免于罚款,具体体现了“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资本家内部开始分化动摇,原来没有交待问题的表示愿意交待问题。至3月20日,已处理13541户工商户(属于一、二、三类者占全部工商户的82%以上),分两批给他们作了结论,并分别发了处理通知书,第二期先后检查了365户(其中严重违法户260户,完全违法户105户)。这样就使广大工商业者放下包袱,安定了他们生产和经营情绪,彻底孤立了少数最反动的资本家。工人群众通过实际斗争,更加丰富了经验,进一步发动起来,全市私营企业职工47720人全部投入了运动。3月初,“五反”运动进入了互助互查阶段,2日,市人民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对违法工商业户的处理问题及在工商界绝大多数的半守法、半违法户中全面开展互助互查运动的问题。会上,副市长陈梅川报告了“五反”运动开展情况和对违法工商业户分别处理的意见。对守法的工商户,虽有一小部分有错误有小额的偷税漏税行为,但能彻底坦白悔改者,政府不处罚、不追补所偷漏的小额税款;对于半守法半违法的工商业户,凡自动坦白悔悟者,只补缴1951年偷漏的税款,退出盗骗的国家资财,而不罚款;对于完全违法户,必须从严处理,要补税退财,还应罚款,性质严重的还应判刑。会议决定,要充分发动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自我改造。在互助互查中,3次对工人进行政策和策略教育,分期召开待查的资本家小型座谈会,宣传政策,至4月3日,近两千户基本守法户与半守法半违法户的互助互查已有1540户查完,正在普遍举行劳资见面,由工人店员审查通过。

(三)核实定案审判处理阶段 4月中旬,在全面检查基本结

束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核实定案处理工作。除根据“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的基本原则,于检查阶段中及时宣布了 13542 户(属于一、二、三类者)的处理外,着重是对四、五类及三类的一部分工商户进行核实定案工作。经过查对材料,职工证实,组织资本家评议,最后由市精简委员会批准的三个步骤,完成了定案处理工作。全市 16690 户工商业户,其中,守法户 2475 户,占 14.83%;基本守法户 12253 户,占 73.42%;半守法半违法户 1625 户,占 9.7%;严重违法户 278 户,占 1.67%;完全违法户 59 户,占 0.35%。全市工商业户的违法所得,经反复查对核实确定退财补税为 1615 亿元,按 4:4:2 的比例,计收回现款 646 亿元,打欠条 323 亿元,变公股 646 亿元。

1954 年,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处理“五反”运动遗留问题的指示,在 1953 年进行复查处理资本家申请复议案件的基础上,又作了一次检查。从“五反”结束至 4 月,资本家申请复议者共 547 起,占全市退补工商户 2188 户的 25%。其中,由于“五反”定案计算偏高,追缴过远或其本人对当时定案的证据和理由提出可靠的反证予以受理重作处理者 504 户外,对绝大多数工商户的处理是正确的。经复议,全市退补总额已由 904 亿元(不含敌产)降为 601 亿元(包括 240 户的罚款 27.465 亿元在内)。“五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广大干部职工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纯洁了工会组织,培养

政府机关的建设。主要经验是：

市委领导头脑清醒，动脑筋有见地。“三反”运动开始后，市委对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是清楚的，有决心有部署。1951年12月27日，谷牧亲自起草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列举了各行各业暴露出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的严重性，说明了开展“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从机关到企业到警备部队方方面面开展运动的部署和要求，重点是围剿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抓住运动的要害；开展运动的决心大、方法对，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带头，发动群众，务求达到目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正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鲁言所讲的那样：毛主席认为济南市的“三五反”运动（这时“五反”运动已开始，市委也有报告）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步骤做法都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特别是“三反”初期，运动刚从开展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开始，尚未进入“打虎”阶段，市委就提出重点清查贪污分子和大贪污犯，这是有见地动了脑筋的。2月6日，毛泽东批示了市委的报告，肯定了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指示各大城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为了掌握典型，指导运动，毛泽东主席还指定将济南作为一个联系点，要求将济南开展两个运动的情况及时直接向中央汇报。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的“三反”运动，而且对全国的“三反”运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及时纠正偏差和失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在激烈的打虎战役中，少数单位由于领导上的急躁情绪、任务观点及对群众政策教育不够，产生了逼供信、侵犯人权等违犯政策的错误现象。为了彻底纠正上述错误倾向，保证“三反”运动健康发展，市委于1951年3月4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第一阶段打虎对所属单位作一次认真检查，并认真教育群众掌握政策，切实保证不再发生逼供信等偏向，对已发生逼供信错误的单位除责成领导立即向全体人员作公开检讨外，并由各级党委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在追赃定案阶段，当发现有些单位对贪污界限的划分、追赃的政策量刑的标准未按上级规定执行，市委及时组织力量对这一工作



进行全面复查,批评了不贯彻政策、不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及怕麻烦草率了事的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的精神,贯彻了党的政策,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由于及时纠错,保证了“三反”运动健康发展。

领导带头,充分发动依靠群众。“三反”斗争中市委始终强调领导带头,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对于运动开展缓慢单位的领导干部,不仅在全市党员干部会上进行点名批评,而且在报纸上给以通报,限期改正;对于阻碍运动的领导干部,予以停职反省,甚至撤职反省;对贪污情节严重而又不坦白的干部依法严办。特别是在工厂企业的反贪污斗争中,坚定依靠工人阶级。一些大贪污分子,都是工人揭发出来的。

(二)“五反”运动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在整个“五反”运动中,始终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坚定不移依靠工人阶级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基本环节,实际上整个运动的过程亦是教育发动私营厂店职工提高阶级觉悟巩固与扩大工会组织的过程。私营企业的工会工作是全市工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但私营企业的职工又是开展“五反”斗争的主力。自开始,市委即抓住了这一基本环节,连续召开了店员、手工工人代表会及各种大小会议,广泛地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动员了全市私营厂店的职工全部投入了“五反”斗争,开展了检举运动。市委特别注意加强了高级职员的工作,举办了高级职员训练班。从发动检举、重点检查、互助互查直至核实定案与处理,整个运动都是紧紧依靠工人、店员的配合,迫使资本家彻底缴械,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五反”运动不仅提高了工人店员以及高级职员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划清了思想界限,而且还巩固、扩大和纯洁了工会组织,全市私营厂店工会会员由 32341 人(占职工总数的 67.76%)发展到 42492 人(占职工总数 89.04%),清除了 126 名打入工会组织的资产阶级“坐探”,同时也提高了职工店员的政治地位。

认真贯彻中央的指示政策,灵活运用“利用矛盾、实行分化、

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斗争策略。市委首先将全市 120 个行业、16690 工商户进行排队,明确了打击对象,召开了中小行业及问题不大的正当工商业者座谈会,具体阐明政策,号召他们积极支持这一运动。并组织运用了“起义”的资本家,让他们到处奔走,劝告坦白,使绝大多数工商户放下包袱得以过关。又及时宣布了对一、二、三类中 13542 户的处理,促使阵营分化,使问题严重态度顽固的 900 余户孤立起来,并狠狠打击了其中偷机倒把“五毒”严重的 337 户(占总工商户的 2.02%)。此外,工商界某些上层代表人物作用很大,运动中,多次找他们恳谈,推动他们带头坦白,并有意识地保护过关,使他们及时放下包袱,更加靠拢政府。

组织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进一步分化孤立资产阶级。为了广泛争取社会舆论及行动上对“五反”运动更大的支持,更加分化孤立资产阶级,市委认真组织了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一方面先后召开了 4 次市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并有各界人士、大学教授、高级职员等的扩大联席会议,迅速扩大了社会统战力量。仅参加实际检查工作的就有民主党派 28 人,大学教授 44 人,青年学生 323 人;另一方面发动与组织了各界妇女、青年、学生 23480 人,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并动员资本家和高职职员的家属、亲人开展规劝和检举运动。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外力高压下没有交待问题者,而在亲属规劝下最后作了坦白。也有一些不愿积极参加检举的高级职员经过亲属相劝后,积极检举了资本家的问题,回到工人队伍中去。

济南市的五反运动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运动初期,对照顾生产注意不够,因而,形成“五反”与生产脱节,使生产与市场曾一度呈现呆滞状态,直到山东分局指出及上海“五反”与生产相结合的经验传播后,才开始纠正了这种情况。在计算违法所得上,从检查到核实定案,仍存在计算过严的现象。

(本文为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组的同志撰写)



文革中济南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李希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50年代就已开始。那时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城镇中一部分未能升学或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去向问题。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文革期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它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当时的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分配。这些毕业生不离开学校,必然影响到招收新生的工作。面对这项急迫的任务,也出于对知识分子情况的“左”的估量,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发出后,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文革中,济南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1968年初至年底,以首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为标志拉开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68年1月16日,市革委召开济南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1万多名毕业生参加了大会。市革委负责人在大会上号召全市1966年毕业生上山下乡当社员。1968年1月20日,市革委又在工农兵剧院召开济南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继续动员1966年、1967年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1968年1月22日,市革委举办的1968年第一批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批下乡上山的同学,满怀激情,豪迈地说:“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省革委会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原省教育厅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在开学典礼

上讲了话。本市许多中等学校的革委会和红卫兵组织,以及军训团的人员,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到会热烈祝贺,并宣读了贺信。

1968年2月19日,市革委举行欢送1968年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省革委会主任、济南部队第一政委王效禹、济南部队负责人杨得志等出席了欢送大会,王效禹作指示,市三大造反组织、省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历城指挥部代表和知识青年家长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向大会宣读了他们的决心书,济南部队、山东省军区、济南市革委会、济南市武装部和革命组织分别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赠送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等。会后,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乘10多辆彩车举行游行欢庆,沿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20日,首批260余名知识青年到达沂蒙山区安家落户。

1968年4月24日,市革委会举行大会,热烈欢送第二批260多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农村。

1968年7月5日,市革委召开大会,欢送第三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00余人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1968年8月25日《济南日报》报道,济南市又一批近300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奔赴革命老根据地临沂地区安家落户。

这一时期,在知识青年下乡之前,一些单位、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为广大的中学毕业生赴农村做准备工作:

1.许多中学的革委会,在军训团的帮助下,纷纷举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这些学习班里,各校军训团和革委会首先帮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的一个观点,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一条谬论,斗一次自己的私心等等。学习班组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参观英雄事迹展览会和泥塑《收租院》,瞻仰革命烈士墓;请解放军老工人讲家史、厂史;请已经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做报告,谈上山下乡的体会等。



2.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对毕业生进行了思想教育。红卫区、向阳区革筹小组安置办公室,还专门组织“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临沂、日照、莒县、莒南等县,深入到公社、大队、贫下中农中间去,带着活思想,狠抓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突出一个“忠”字、大讲一个“用”字。同时,还组织参观访问,请老贫农、老红军讲革命斗争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在贫下中农的指导下开展斗私批修,并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等。

3.在知识青年下乡上山临行前,各区、学校、街道分别举行欢送会,赠送毛主席像章、宝书四卷和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

二、1968年12月至1969年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高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

宣传、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活动在全市迅速展开。

当日下午,市委召开“济南市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师大会”,来自全市的红卫兵和省、市机关干部共5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号召,全市来一个大动员,迅速展开对毛泽东最新指示的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要把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动员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去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加强领导,做好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安置工作。同时,要办学习班,组织广大知识青年、干部、职工、街道居民和其他人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大会最后宣读了《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关于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进一步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通告》。

全市广大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及随军家属,收听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后,顿时群情振奋,一片欢腾,连夜集会、游行,召开座谈会。济南国棉三厂革命职工,开完座谈会后,马上组织力量,到职

工家属中进行调查。济南化工厂第二届政工会议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做出决议,立即动员全厂家属、高、初中毕业生及长期脱离劳动的人到农村去,坚决走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道路,并通过了给全厂职工家属及毕业生的一封信。

许多单位都把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济南化肥厂革委抽出一名常委、一名委员组成领导班子,在厂革委领导下,与学校紧密配合,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工作。并将本厂积极支持自己子女上山下乡的职工、家属充实到领导班子里来,组成有力的宣传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领导力量。厂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定措施之后,又分别召开各车间、各分管负责人会议、家属委员会议,层层传达,布置任务。厂革委针对职工、家属及其子女在下乡问题上的活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召开全厂职工、家属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掀起上山下乡高潮誓师大会时,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家长请上主席台,请他们的代表讲斗私批修和动员子女上山下乡的经验。请已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本厂职工子女讲上山下乡的收获和体会。厂革委还深入车间、职工宿舍、家庭去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负责上山下乡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都亲自挨门挨户地到职工家中去谈心,进行动员。该厂还举办了领导成员学习班、有结业子女的职工学习班、家属学习班等,反复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进行回忆对比,解决各种思想问题。

在浓厚的上山下乡的氛围中,特别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许多家长主动动员、鼓励自己的子女到农村安家落户。市武装部老红军战士、副政委胡振荣回到家里,就把大女儿叫到收音机前,反复倾听毛主席的指示,并对女儿说:“毛主席叫你们青年到农村去,这是对你们的最大关怀。”大女儿听后很受感动,激动地表示:“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去农村。”济铁二小教师杨竹君和女儿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立即叫她到学校去报名下乡。教师李



继春把自己两个小孩留在家,当夜赶回娘家动员两个侄子到农村去。红旗区革委会主任林志敏,带头把两个中学结业的女儿送到农村去。街道居民穆俊兰大娘,不仅把自己的小女儿送到农村去,而且说服了3位家长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农业生产第一线……

1968年12月底,全市1400余名知识青年,手捧红宝书,浩浩荡荡地奔赴昌县、济宁、惠民、新泰等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批下乡的知识青年中,47中125名学生,在奔赴农村前夕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坚决走您指引的革命路,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滚一身泥巴,锤炼一颗红心。已经分配到工厂里去的知识青年李增利,毅然到农村安家落户。他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毛主席叫我们到农村去锻炼,我就坚决去。”还有山师附中166名革命师生,他们怀着革命豪情,手捧红彤彤的宝书,背着行李,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战歌,走老红军的道路,徒步奔赴惠民地区安家落户。

纯朴的农民们对知识青年持欢迎态度,积极安置。惠民县三茬口公社马家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崔清爽说:“今年10月,听说有一批知识青年到俺县安家落户,都欢喜得拍手叫好。俺们向公社里抢着要,才‘抢’来了9个。为了迎接他们,俺们宁肯自己住得紧一点,也要腾出好房子来给知识青年住。这批知识青年来的那天,俺们敲锣打鼓跑出五六里路去迎接。进村后,贫下中农有的送毛主席宝书,有的送毛主席像章,还有的送了衣服和鞋袜。才开始,大部分知识青年都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俺们就手把手教。”惠民县申桥公社高玉畔说:“从今年7月,俺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整天盼着知识青年到俺大队来,现在毛主席发最新指示,俺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历城东郊公社大辛大队、仲宫公社西老泉大队、北园公社杨庄大队的贫下中农,都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决心做好住房和生活等方面的准备,迎接城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太阳升公社革委会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下乡政治、组织、生活三落实,确定各大队革委会主任做知识青年

的政治辅导员，派阶级觉悟高的老贫农担任农业技术辅导员，选阶级觉悟高的社员做生活管理员。积极解决住房、吃饭、生产工具等，积极筹备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

到1969年1月底止，济南市已有万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这一阶段，除知识青年踊跃报名上山下乡外，一些城市居民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三、1970年至1973年，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缓慢发展，下乡的主流方向是边疆和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全国在国营农场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内蒙古、兰州、江苏、福州、安徽，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农建师、西藏生产建设兵团。因此，从1970年始，济南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除一部分仍然到农村插队外，大部分到了边远边疆，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特别是从市委向全市知识青年发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动员号召后，广大知识青年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声中，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人民立新功的雄心壮志，踊跃报名，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1970年3月20日，济南市热烈欢送1970年首批应届高中毕业生260多名到农村安家落户。

1970年3月26日，红旗区400余名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奔赴济宁地区安家落户干革命。

1970年3月26日上午，济南一中和十六中的28名毕业生，打着红旗，背着行装，徒步分别到莘县、东阿县的农村插队干革命，和他们徒步到农村插队的还有1名教师，2名原市级机关的干部。他们受到全市中学5万余名革命师生热烈的夹道欢送。

1970年3月30日，又有300余名知识青年、革命干部、革命教师满怀革命豪情，奔赴聊城、泰安地区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

1970年5月16日，济南市2万余人在“八一”广场隆重集会，热烈欢送3000多名知识青年、干部、街道居民响应毛主席的



伟大号召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

1970年9月24日晚,济南市700余名知识青年,满怀豪情,离开济南,奔赴祖国的边疆。

1971年5月,我市1800余名知识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山东生产建设兵团。

1971年5月16日和21日,又有1000余名革命知识青年于分别参加济南部队山东生产建设兵团。

四、1974至1976年,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出现高潮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大形势下,济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一次形成高潮。这一阶段,济南市多次召开会议,层层发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4年6月中旬,市委召开区、县、局负责干部会议,部署全市1974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要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充分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动员自己中学毕业的子女上山下乡,带动全市广大群众,迅速把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开展起来。7月13日,市委召开5000人参加的全市机关干部大会,作进一步动员。8月14日,省和济南市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号召切实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在全省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8月26日,市委召开干部大会,进一步部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强调加强领导、做好动员工作,迅速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高潮。

主要措施:

选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1974年8月16日,省委批复同意市委《选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干部的意见》。市委决定从市、局、区级机关和有关基层单位中选派700名在职干部带队,随同知识青年到农村,协助当地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教育和

巩固工作。

学习推广湖南省株洲市按系统下放、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识青年的先进经验。按系统下放,就是将知识青年按其父(母)所在单位,由各单位把他们组织起来,集中下放,由单位自己动员、编组,系统领导,单位自己办理手续,到指定的地方对口安置。就是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街道包居民。学校主动配合各方面做好毕业生的思想教育,为系统动员创造条件。

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各级党委根据市委的部署,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普遍进行了调查摸底,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和思想发动。

强调各级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积极带头作用。1975年8月,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了5点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要带头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头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坚决抵制纠正“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要严格留城条件,反对弄虚作假。

在新一轮的上山下乡高潮中,广大知识青年雄心勃勃地奔赴农村。

1974年8月15日,济南市举行20万人欢送大会,欢送100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4年12月5日,全市25万人欢送第二批1.5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5年7月29日,欢送2000余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75年9月20日下午,济南市委、市革委在“八一”广场隆重举行大会,30万群众欢送15000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干革命。

1976年,全市又有13000余名知识青年报名上山下乡。

自文革开始至1976年7月,全市已有76000余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干革命。其中1974、1975两年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45000人。



文革中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狂潮,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但广大下乡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在这场运动中为国家和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济南市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7万多知识青年,他们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战斗在农村,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年代献给祖国边疆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1970年,济南市700余名知识青年报名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奔赴边疆。他们同各地知识青年团结奋斗,在沉睡了千百年的乌兰布和沙漠里,顶烈日,战风沙,治盐碱,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使乌兰布和的面貌大为改观。许多地方已是树成林,渠成网,田成方,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在鲁北平原沾化县李雅庄大队插队的50余名济南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头一年冬季,同贫下中农一道,奋战40天,改造盐碱地近千亩。第二年秋,大战80天,新挖沟渠9条,为农业的增产增收做出了贡献。在牧区担任放牧工作的济南知青们,有的为了让羊吃上草,常常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放牧。有的知青为了把骆驼放好,就带上粮食、被子到远离连队的草场去放牧,饿了自己做饭吃,晚上守着骆驼群睡觉,蚊叮虫咬烈日晒,从不叫苦。有的知青遇到母羊生羔,怕把羊羔冻死,便脱下自己的棉衣,把小羊羔包起来抱回家去。

有不少的知青利用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1972年,济南下乡知识青年张平经过刻苦学钻研,学习了无线电元件制作工艺,生产出了晶体管,帮莒南县厉家寨大队办起了无线电元件厂。日照县大株洲大队的济南下乡知识青年试制成功打麦机,减轻了劳动强度。被群众誉为科学实验尖兵的阳谷县司营大队济南下乡知识青年曹义军,试制成“混合曲糖化饲料”、“九二〇”、“杀螟杆菌”等,对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养猪事业做出了贡献。莘县大姜庄大队知识青年为大队培育的玉米、高粱优良品种,在1971年推广后,产量增加30%。

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长期劳动、学习、生活中,同当地村民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宁阳县陈庙大队插队的济南知识青年,组成了12人的医疗小组,热情为村民治病。3年中,他们出诊看病4500多人次,不仅治好了许多常见病,有些长年卧床病人,经过他们治疗也恢复了健康。吴家堡公社西河大队下乡知识青年张建华,利用业余时间为群众针灸治病,半年多来,先后治好了50多个社员病,并治好了一个瘫痪和一个聋哑20年的病人,被人们称为“好医生”。担任农村小学教师工作的肥城县潘台大队济南知识青年王超、夏津县前王寨大队济南知识青年孙慧君、东阿县麻任大队济南知识青年田云等,在工作一线中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济南市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在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中有的入了党、入了团,有的被选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有的担任了教师、赤脚医生、会计、保管员等工作,成为农村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代骨干。仅1974年和1975年下乡的40000多名知识青年中,就有200多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0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2800多人被选进了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6290人担任了赤脚医生、教师、农机手等,有3500多人出席了各级人代会,有175名出席了省知青代表大会。

至今仍有不少当年的知青,在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他们虽然是在那场狂热运动的裹挟下来到农村的,但他们爱上了农村,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并且留在那里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一代农民,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最初的理想。



历下区解放初期至 70 年代 婚姻法的贯彻落实

一、婚姻法的颁布

1948 年前,结婚和离婚按传统风俗习惯办理,政府不办理婚姻登记。

1950 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规定结婚年龄男 20 周岁,女 18 周岁。男女双方自愿结婚者,持单位证明信到区政府办理结婚登记,1955 年改为在街道办事处办理。1963 年,济南市提倡晚婚,规定结婚年龄男 28 周岁,女 25 周岁,1971 年改为男女各 25 周岁,1973 年又规定男 27 周岁,女 25 周岁。

70 年代末,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对 50 年代的《婚姻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并于 1980 年颁布实施。

二、婚姻法的宣传贯彻

1951 年 12 月,根据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第一、二区政府组织青年、妇女掀起宣传婚姻法的热潮,据一区统计,宣传中共召开宣讲会、讨论会、座谈会 82 场次,参加人数 10097 人。通过各种会议及收听小组、夜校等学习组织,利用口头文艺广播宣传方式,新式结婚案件公审,调解问题向群众进行了婚姻法的宣传教育,使群众初步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婚姻自由观念已基本树立。但一部分群众对封建的婚姻制度尚认识不足,旧的封建家庭婚姻制度尚未遭到彻底的破坏。1951 年到 1952 年两年间,结婚的共有 818 对,其中恋爱结婚的 345 对,占总数的 42.18%;经人介绍儿女做主,父母同意的 404 对,占总数的 49.4%;

经人介绍父母做主儿女同意的 53 对, 占总数的 6%; 父母包办(包括买卖婚姻的三对)16 对, 占总数的 1%。

1953 年开展了宣传婚姻法运动, 3 月份, 政府进行了贯彻婚姻法宣传月活动。在运动中分训练基层干部和全面向群众宣传两个阶段。由于注意发挥了妇女代表委员会的作用, 在干部和群众中系统地批驳了旧思想、旧习惯, 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界限。许多妇女自觉地召开了家庭会议, 修订了公约, 涌现出了不少和睦幸福的新家庭, 转变了旧的家庭关系, 给之后贯彻婚姻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阶段全区共教育 687 人, 妇女 267 人。在学习前, 存在着几种思想, 大部分干部对运动的目的不了解, 对违反婚姻法如何处理不明确, 同时部分干部存在混乱的思想, 阻碍了批驳旧思想。还存在一些谣言和错误说法, 有的说“运动月内要破寡妇一律改嫁”、“三月份是离婚月”、“重婚要匀出一个老婆来”等。有些干部和群众对新婚姻制度的婚姻自由认识似是而非, 不知道家庭夫妻的关系, 父母子女的关系, 对男女平等认识不足。区妇联以居民区为单位, 采取集中上课, 分组讨论的方式, 组织群众学习了 13 天。向群众全面交待了运动月的性质、方针、政策、目的, 使干部们的情绪稳定。然后分三课讲解了婚姻法的基本精神, 使干部们明白了婚姻法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保护什么, 思想上初步划清了新旧制度的界限。第二阶段向群众们全面展开教育。向群众宣传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 通过大小报告全面讲解了婚姻法, 同时运用了文娱宣传、图片展览等形式进行了宣传, 有 51310 人受到了教育。运动开始后, 妇联还按照系统进行了教育, 至运动结束又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将贯彻婚姻法的工作转入经常化。

通过这次运动, 群众真正认识到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是合理合法的, 体会到新式婚姻对国家、对生产、对人民都有好处。父母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童养媳等旧制度在群众的思想上已成了不合法的东西。男人们体会到了妇女劳动的价值, 知道妇女不是男人养活的, 普遍表示以后有事会和妻子商量, 共同劳动, 建



立新家庭。运动巩固了婚姻关系,家庭不和、打骂虐待妻子的行为成为了耻辱。妇女们也转变了吃人饭服人管的思想。婚姻法给受虐待的婚姻、父母包办的婚姻指出了方向,坚定了他们争取婚姻自由的信心。很多受束缚的妇女以前不能外出参加活动的都走出来参加了学习和社会活动。全区有 351 户改善了家庭关系,转变较突出的有 128 户。马家湾涯妇女王淑香,家有公公婆婆等九口人,公公婆婆经常打骂媳妇。在王淑香当选宣传婚姻法组长后,全家参加了学习,召开了家庭会议,互相进行了检讨,公公婆婆变了样,全家感情也变得融洽了。太平街的梁继先过去经常打骂老婆,其母也经常虐待儿媳,儿媳只能忍气吞声。通过学习,梁继先认识到妇女在家劳动的价值,向妻子做了检讨。他的妻子见到邻居高兴地说:“我也解放了,婚姻法真是活菩萨。”5 月,在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的基础上,历下区民政局配合市民政局、市法院训练了婚姻登记工作人员。对全区的婚姻登记工作进行了检查。登记干部对政策的掌握有所提高,在登记时对登记人做到了宣传教育和调解工作,基本贯彻了婚姻法的各项规定。

1954 年 3 月,区妇联在密切结合中心工作的前提下,配合政府进行了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根据市婚姻法运动委员会的指示,以政府为主,各有关部门首先召开了会议,做出了具体工作计划,检查内容。3 月 8 日,由市法院一、二区分庭、区妇联、民政股及区团委、工会共七家单位组成检查组。3 月 11 日以 1953 年 3 月 18 日的婚姻法宣传提纲为主进行了婚姻法学习,进一步划清了新旧婚姻制度的思想界限,明确了检查的目的与要求。检查以派出所为单位,召开了各所妇代会、基层干部座谈会。

检查中发现自 1953 年 3 月进行了婚姻制度的界定,一般均能自觉遵守执行婚姻法,但由于几千年来旧礼教的束缚,封建婚姻制度残留影响尚未彻底根除,一年来在婚姻问题上自杀、虐待等现象仍然存在。据统计,杀婴、弃婴 9 起,妇女自杀者 3 起,自杀未遂者 6 起,其中两起系婆媳不和,三起系夫妻不和。在婚姻登记

方面,群众觉悟有很大提高,骗取结婚证、强迫包办等现象已基本不存在,从本年 667 对登记结婚者来看一般均能照章办事,遵守婚姻法。在处理婚姻案件方面坚持了说服教育的方针,一年来共处理了婚姻案件 302 件,其中妇代会和其他基层组织直接处理者 156 件,区妇联协助政府处理的 46 件。通过案件的处理,同时向 906 人进行了婚姻法教育,使其端正对婚姻问题的看法,既使问题得到了正确的处理,也推动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次通过案件的处理,有力地支持了妇女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保证了革命军人的婚姻。

通过婚姻法的宣传改造了不少的旧家庭,改善了夫妻与婆媳关系,使家庭走向和睦团结。如本区三所,在宣传婚姻法前,全所 3300 户居民中有 21 户经常闹家务纠纷,通过婚姻法的教育,家庭不民主不和睦的明显减少。检查中还发现通过婚姻法的宣传出现了不少争取婚姻自由的男女,妇代会组织支持了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如青年妇女章茂秀于 1952 年自由恋爱,受到母亲的反对阻挡,有了政府和妇女自己的组织的支持,他们登记结了婚,夫妻感情很好。通过教育,其母也逐渐转变了思想。几千年来妇女受尽了压迫,男女不平等,男人死了妻子可以再娶,旧社会视为理所当然,女人死了丈夫另行改嫁则视为大逆不道。通过婚姻法的宣传,受压迫的妇女鼓起了勇气,以前从不敢提出改嫁和脱离旧家庭的寡妇,解除了封建的束缚。按本区三所的统计,一年来改嫁者有 5 名,争取脱离旧家庭者 1 名。如青年妇女张淑贞,十七岁结婚,婚后 30 天就死了丈夫,社会的舆论说她克夫。她的家庭安排她住在楼上,并且将窗子堵住,不让她见人。这个青年妇女一直守寡六年,随着新婚姻法工作的开展终于得到了解放。

1955 年 3 月,在区委的领导下,全区各界妇女以“三八”妇女节为契机,投入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运动,以实际行动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到来。通过运动向广大妇女进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在婚姻法问题上系统批驳旧思想,旧制度和



旧习惯。在政府及婚姻法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组织起各工厂、街道妇女干部认真学习婚姻法和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的关于贯彻婚姻法的两个指示。配合工会召开私营厂、店的女工、女店员及职工家属教育会议;配合文教股利用周末向全区女教师及妇女夜校学员进行婚姻法的宣传。

195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全区开展了一次婚姻法宣传活动并对执行婚姻法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活动重点是教育广大青年及人民群众树立孝敬父母、养育子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同时,对夫妻不和、婆媳不和的家庭做了重归于好的调解工作,对虐待妇女、不赡养父母的事件进行了处理,对侮辱妇女等犯罪分子依法惩处。依据上级的指示,以区人委为主,由区妇联、区团委、公安分局、区法院、区检察院、民政科、文化科参加组成领导小组。各办事处按照实际情况,组织以办事处主任、派出所长为主、吸收团支书、妇女主任、居民主任参加的3~5人组成工作小组,进行指导工作。宣传中充分发挥文化馆、电影院与群众俱乐部的组织作用,向职工、居民进行形象化的宣传。同时,通过法院对典型婚姻案件的公审和公开宣判等活动向群众进行了法纪教育,加强法制观念受教育者达34336名,全区90%以上的居民受到了教育。检查工作结束后,有关部门制定了开展“五好”家庭活动,加强婚姻登记等工作的措施。

1957年后,随着婚姻法的宣传工作开展,新的婚姻法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广大妇女及群众均能自觉遵守婚姻法的规定。区妇联通过每年“三八”节开展婚姻法的宣传工作,结合“五好”家庭评选工作继续宣传移风易俗,提倡新的结婚仪式,结婚不收彩礼,不拜花堂,不讲排场、阔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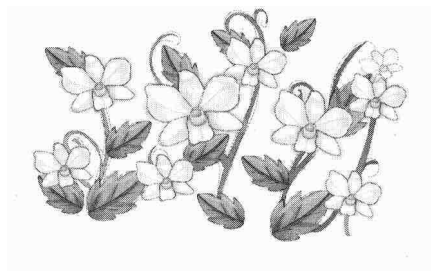
婚姻登记工作是经常具体贯彻婚姻法,保障婚姻自由的一项重要工作。1962年,区民政科制定了《关于做好婚姻登记工作应掌握的几个问题》。通过对婚姻登记工作者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新婚姻制度的宣传者和保护者,克服了“婚姻登记是单纯

的技术工作”、“婚姻登记工作无前途”等错误思想。

1963年区人委为更好地贯彻婚姻法，在部分办事处对婚姻登记工作进行了一次调查。从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通过几次大张旗鼓的宣传与检查婚姻法运动，以及经常的宣传教育，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新的婚姻制度已经建立。婚姻家庭制度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性质到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70年代后，区妇联配合有关部门重点抓了计划生育工作，并要求干部以身作则。同时，在未婚青年中大力提倡晚婚，教育男女青年树雄心、立壮志、先立业、后成家，教育他们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恋爱婚姻观，正确处理婚姻恋爱问题。

(本文为历下区委党史办专题)



专题研究

纲,学校体育走向了统一正规的发展道路。国家体委、教育部派人来基层进行讲授、辅导;济南市总工会组织职工篮球比赛,历下区代表队获第五名。10月,历下区著名武术运动员朱宪章、金延年、孙继光、赵百顺等作为省武术代表队成员赴上海参加华东区武术表演,获优秀奖。11月,响应省、市体委号召,历下区职工、学生、居民开展北京—莫斯科象征性长跑活动。1957年9月,建立历下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教练员大都是区体育教研组的成员,校址设在皇亭体育场内。当时开展的项目有:田径、球类、体操、射击、无线电收发报等。10月,孙继光、朱宪章等作为山东省武术队成员参加全国武术表演赛,均获二等奖;历下区职工篮球比赛在皇亭体育场举行,农具厂、柴油机厂、肉联厂、中心医院等13个单位参加比赛。各中、小学普遍开展劳卫制锻炼活动,济南一中、皇亭小学在球类、田径、游泳活动中成绩十分突出,竞赛名列全市前茅。1958年9月,皇亭小学、济南一中被评为“全国体育红旗学校”。皇亭小学的优秀游泳运动员王玉英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被选拔进入国家游泳队。10月成立了区体育运动委员会,配备了专职干部,隶属区政府编制,领导和协调历下区体育工作的开展。11月,在莱芜县召开的体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历下区被评为体育红旗区。1959年撤销体委建立体育科。1959年4月,历下区组织参加市中小学篮球、排球比赛,分别获得小学篮球第二名,中学排球第三名。5月,济南市中、小学生航模、射击比赛,历下区皇亭小学获航模团体总分第一名,济南一中获射击比赛第二名。10月,举行历下区第一届田径运动会,此届运动会是为庆祝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而举办的,历下区各行各业职工、学生、街道居民、基层民兵等两万多人参加了大会。1960年3月,历下区组队参加济南市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获得小学组田径比赛总分第一名,中学组男子体操第一名;历下区武术表演、摔跤比赛在皇亭体育场举行。

建国初期的十年中,历下区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烈,竞技体育成绩在济南市名列前茅。中共中央对学校体育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党中央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贯彻实施,学校体育有了明确重要的地位,学校体育以劳卫制为中心项目得到普及推广。历下区的学校体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了一个系统的发展阶段,为以后历下区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体育教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培养、锻炼、壮大了体育教师队伍。举办全区性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五次,各种形式的体育比赛每年都在20次以上,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逐年提高,《劳卫制》达标率80%以上,学生的身体素质有了明显的增强,各种项目的运动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涌现许多优秀的运动员,如:体操运动员曹立业(健将级),游泳运动员周同文(破全国纪录),田径运动员姜士英、曹亚琪、张立森、王俊祥等人都是市级比赛金牌获得者或市纪录的创造者。区政府十分重视体育设施的建设,多次拨专款对原有的体育运动场地进行扩建、改建、更新、维修,增添了运动器械和设备,并新建了一批体育设施,使之成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阵地。

1961年4月,体育科与卫生科合并改称体育卫生科,11月25日,区委行文“关于各街道办事处建立太极拳辅导站的意见”。1962年3月,文化、体育并为文体科。

1961~1963年生产救灾时期,历下区各种体育活动压缩到最低限度。主要是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围绕党的生产救灾运动的中心,从实际出发,因时、因人制宜开展一些小型多样、保健医疗性的微量活动,以增进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为国防服务。各类竞赛活动大大减少,学校的体育课程运动量大为减弱,每年除召开一次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外,一般不举行全区性的大型活动,全区体育运动处于低潮阶段。

1964年5月,历下区文体科与教科召开学校体育工作会议,根据省、市体委、教育厅(局)指示,学校体育以抓好体育教学,

开展保健活动,恢复和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为主要工作方向。同年青年游泳池移交历下区体委管理、使用。1965年5月,区体委在位于青龙桥北、老东门南处,利用护城河水道,设网截流,建成了一个长120米,宽20米的简易游泳场,并建设了更衣、护池、办公、管理等设施,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游泳锻炼的场所,盛夏季节每天平均接待游泳爱好者1000多人次。后来由于泉水水位下降,河水流量减少,并且污染严重,于1973年停止使用,其房屋设施移交区政府改作招待所用。1966年4月,县西巷小学获全国田径通讯赛(济南赛区)第五名。

1964~1966年,历下区体育活动处于复苏阶段,学校体育逐渐走上正规,体育教研组织恢复正常工作,业余体校的训练活动又开展起来,社会各阶层群众体育锻炼渐渐形成热潮,以皇亭体育场为中心的各层次的体育竞赛活动逐步开展起来,历下区体育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动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机关企事业单位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1967年2月由群众组织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历下区人民政府及各职能部门不再行使职权。1969年10月,历下区革委会成立文体宣传站领导小组,管理体育工作。1970年6月,历下区举行群众性横渡黄河游泳活动。1971年4月,革委会设立体育组。5月举行一次小学生田径运动会。1973年3月,举行全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体育组根据游泳训练和竞赛要求,对青年游泳池进行了改建,建为长50米、宽15米、6泳道、水磨石池底的游泳池,增建了东、南两面观众看台和护网,并新建了抽水、净化、更衣、管理等配套设施。1974年下半年至1976年,由于社会上又刮起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引起混乱,体育工作再度中断。1976年2月由体育组改称体育运动委员会。10月,全党、全国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1966~1976年,历下区的体育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体育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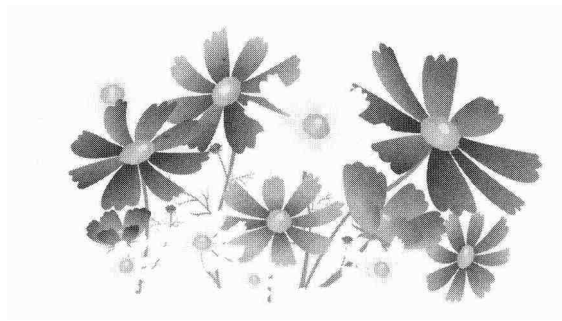


1. 100-1000-1000
2. 100-1000-1000

1/2

育工作迅速恢复了生机，各校体育教研机构得到恢复和健全，体育教师队伍得到不断补充、壮大。体育教学逐步走上正规，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和上课教案，改变了文革时期以政治运动为目的，人海战术为手段、放羊式的教学方式。

(本文为历下区委党史办专题)





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

周恩来同志与王祝晨先生的情谊

王 恒

1925年4月,北洋政府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发表“特任张宗昌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命令,张宗昌率兵于5月7日(旧历4月15日)入鲁,山东人民又陷入黑暗的深渊中。到任后马上更换政府要职人员,教育厅长一职由清末最后一次殿试的状元王寿彭担任,其实他是与王祝晨同去北京参加殿试的同学,彼此都知底细。他为报张宗昌知遇之恩,立即全面复古。事有凑巧,当年12月25日“济南市纪念云南起义大会”上,王祝晨发表了抨击军阀、遭逢时忌的演说,并第一次提出“要铲除旧的封建残余势力、要中国新生,就要国共合作。”他劝“知识分子不要只向上看,而要向下看,一切为人民服务。”这叫本来就烦新派的王“状元”厅长大为恼火,立即向张宗昌汇报,张派人把王祝晨喊到省府大厅,当众大骂王祝晨“混蛋!混蛋!”骂够了“混蛋!”来了一句“滚您的蛋吧!”王祝晨平平安安回了家,这可气坏了欲害王祝晨的王寿彭,于是千方百计地收集王祝晨的“黑材料”。1926年初,王寿彭忽然从王祝晨办的《一师周刊》上发现一篇“伤痕”(散文诗,一学生写的,描述女性在当时是大胆了些)。当然这是他手下的人员呈上的,不要忘记,王祝晨在当上校长后,一下子就辞退了七名举人教师,其中有二人成了王寿彭的左右手。于是王寿彭放出风来说“《一师周刊》有伤风化,校长应引咎辞职!”但王祝晨不理不睬。王寿彭的手下们造谣污蔑,人身攻击,王祝晨仍不为所动。于是王寿彭下令《一师周刊》停刊、查封处理。王寿彭时时在张宗昌耳边,说些新文化如何如何有害的话,张听其言,向新文化开刀,一下子全山东完

全陷入复古的浪潮中。王寿彭当众宣布：一、禁止学白话文（包括全山东全社会），改读四书五经；二、带领全省校长去曲阜拜孔，并行跪拜大礼；三、取缔女学生剪发，剪发者不得入学，后又不准女学上学；四、宣传上以圣贤之邦来教育人民，大兴古风。1926年2月8日王寿彭认为时机已到，对王祝晨下了撤职令，王祝晨接到后立即交卸职务，在家整理山东民歌并上北京学习三个月的新教学法。（当时“撤职”一词是与“枪毙”一词是同义词，在外地的学生们与他的同事，都以为他被枪毙了，一些地方为此召开了追悼会，这是事后人们告诉他的。）王寿彭要全面复古，就要去掉阻碍，他就在王祝晨曾是同盟会员上下工夫，令人造谣他是乱党成员（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都被称作乱党）迫使张宗昌下发通缉令，巧的是这位侦探（当时称呼，即抓人的特务）识字不多，到私立明德小学求一教师替写报告，内容其中有“山东乱党的大本营在一师一中，而其中领导人是王祝晨。”的字句，当天即11月10日，写字人马上告知校长杜助，杜立即派亲信深夜告诉王祝晨。王祝晨认为事出有因，并不惊慌，第二天清晨找一同乡探问曾做过齐河县长的现军法处长李祥麟是否有此事，李告来人“密报已经成堆了，一查就出大事。”王祝晨于是找了几位朋友商议对策，朋友们坚劝要其连夜出逃，王马上换成商人模样，改名换姓，棉袍毡帽长围巾，深夜二点（即12日）去了火车站，遇到附小学生现为货车司机的小刘。小刘不容细说，先把他藏匿在票房里，然后就带王上了火车，坐在驾驶室内直奔南京而去。也就在当夜，逮捕王祝晨的“通缉令”发出。到了南京，正值军阀孙传芳与褚玉璞互相摩擦，车站上无人检查，遂急忙换车去了上海。在上海遇到朋友范予遂（解放后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东省主席），他劝王去武汉，说国民政府将从广州迁往武汉，那里将是全国政治中心，但王认为广州是革命发源地，不去广州将是终生遗憾。于是王一人乘船经汕头、过香港、20日中午到达广州。他高兴地走到街上，满身是汗，街上行人与店铺顾客与店员都惊异地看着他，他忽然明白过来，原来



他的棉衣在这里太显眼了。冬季的广州依然是鲜花满街。他急忙到店家买了一套适合当时的服装,乘车去了他最向往之圣地——黄埔军校,到该校去参观和学习,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佩和对国民革命的拥赞。到了黄埔军校,找询几位从山东来的学生,一下子出来了十几位山东籍学生包围了他,亲切地呼喊老师,热烈拥戴着把他送入会客室,这个倒水端水请洗脸,那个让座忙沏茶,七嘴八舌争着询问山东的形势。这些学生多半是济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是济南第一中学和其他学校学生。他们多数是在王祝晨的影响下,走向广州革命圣地的。说话间又来了一些山东籍学生,一些外省的学生也来听外地的新闻,一时大有人满为患之感。王祝晨与大家亲切交谈,有时提问太多,真不知回答哪一个好。正在热烈交谈中,周恩来同志忽然笑盈盈地来了。进门就笑问:“看来您就是刚到的王祝晨先生吧?我是周恩来。”王祝晨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忙站起,两人热情握手。“听说您还是北洋军阀发出通缉的‘通缉犯’,好啊!我们这里特别欢迎北方来的遭通缉的朋友,他们的‘通缉令’在这里不但完全失效作废,而且您还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朋友,王先生,您可以痛痛快快地在广东土地上行走了,呼吸一下这里的自由空气吧,稍做休息,我还要请您与大家谈谈山东的形势,给大家上一课。我已经听您的山东学生同我讲了,您是位不可多得站在时代前面的好老师,您可不能只给山东的学生吃小灶啊!一定要请您为大家谈谈,我这样说不知可以吗?”王祝晨愉快地回答:“完全可以。”周恩来同志说:“好,那就这样定了,这些都是您的学生,我看我们这里这些学员和教员,特别是我,都要听听来自火线第一线上的战士是怎样斗争的,请您再给大家一些压力,我们的北伐的力量就会加大,信心就会更增强,您们说对不对?”大家一片赞同声。二天后的一个上午,王祝晨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在大礼堂中讲演。周恩来同志首先致词,他说:“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既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位重操守的革命教育家——王祝晨先生。他是来自北洋军阀统治

下的一位被通缉的‘通缉犯’。遭北洋军阀通缉,那一定是他做了有害于他们统治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他的作为动摇了军阀的统治,才能被通缉,所以我说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通缉犯’,在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人,是我们的上宾,因之王祝晨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师。在座的有近二十位是他教的学生,而且都是在他鼓励和帮助下走向革命之路的,王祝晨先生是位进步追求民主自由的老师,现在我们请王祝晨先生为我们作报告。”在热烈掌声中,王祝晨详细介绍了山东形势和他为什么被通缉的经过。讲演中间,时时为笑声和掌声所打断。同时也解答了一些提出的问题。王祝晨后又与周恩来同志私下谈了一二次,王祝晨积存多年的对中国前途理解问题与国民革命去向问题通通提出请周恩来同志作回答。周恩来同志笑着先邀请王祝晨参加听课。王祝晨当学生全天听了十几次课(也是全校最老的学生)并结识了一些中共和国民党的部分教师与学生。临走时周恩来同志亲自送到学校门口,说:“再一次感谢您为我们上了一次既生动、又实际的课。您来后的所作所为使我看到了一位革命教育家是怎样对待学习和对待生活的,那就是说时时追求学习新的永远是人生第一位,这其中是没有什么年龄段的,这使我们感触很大,影响是深远的。您提的问题是不易答复,但不是不能答复,而是中国社会太复杂。我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但道路是曲折的,因之斗争的策略也要随时机的变化而调整,但我们坚信一定成功。这样说不知可否?”王祝晨点头说:“我是教历史的,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时期太长,袁世凯是死了,但北洋政府都是封建和专制的拥戴者,打倒他们,说不定又出来个李世凯、张世凯要做皇帝,道路是艰难的,但我们都看见了曙光,对不?”周恩来同志笑着说:“那咱们就一起来打倒李世凯、张世凯,和形形色色的皇帝,在我们这新一代手上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来!”大家一齐欢呼。周恩来同志亲送王祝晨上了汽车。这正是“上海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1926年10月)周恩来同



志在广东黄埔军校的整顿时期。这一次黄埔军校之行影响了王祝晨的一生,这不只是思想上,当然思想上可以说是个认识的转折点,同时由于在这里认识了一些人,这些人由于认识了他,在他一生旅途中,大部特别在一些关键时刻,多数人帮助了或者说救了他性命,不可讳言,也有个别人因此出卖过他,使他命运中雪上加霜、多舛,这是后话。王祝晨又专程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了十几天讲话(当时该所已不正式公开上课),也访问了“中国国民党研究院”(其中很多为共产党员,这是国共合作时期),在此他也听了几次课和见到一些来自山东的朋友与学生。

王祝晨晚年曾说“广州黄埔和农民运动会之行是我的哺乳时期。”在广州遇到了宋还吾(也是他的朋友,后为济南第一中学校校长),他们一起去了武汉,到时正值1927年元旦,全市正召开“欢迎国民政府迁鄂大会”,一派欢乐气氛。一月三日,英国人制造了惨案,杀害了一些无辜老百姓,国民政府也趁机收回了英租界。一月十五日王祝晨入武昌“党义训练班”学习,该校名为国共合办,实为共产党一手经办,所长是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同志。他讲“工农运动”、恽代英讲“青年运动”、李俊汉讲“唯物历史观”、李达讲“社会学”、李季讲“马克思和近代革命史略”、“世界革命史”,还有叶青的“托洛斯基传”等。在三个月的学习过程中,他与董必武同志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成为朋友。当然他认为自己的新学说根基太差,特别在介绍马克思学说方面他认为教学上比较混乱(例如李季与叶青的思想就与李达完全对立),各派学说都有、各派都各立门户,各说各有理,因之他自己思想中有了些难以理解和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存在,再加上他对自己一向非常严格,当同学们来动员他是否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时,他犹豫了,思想斗争异常激烈,班中少数“极左”同学指名他旧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他自己也真切认识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不知何时肃清。于是在快结业时加入了国民党,立志做一名真正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国民党员。学习期间社会上喊“打倒个人独裁”,这说明

汪精卫与蒋介石开始公开摩擦,国共两党不同观点也在报上公开攻击对方。王祝晨认为国共合作来之不易,和必兴,北伐战争的成功全靠国共合作。国共应合作、宁汉应合作,这一观点马上遭到班上有些人的反对,有人就报告了当局,这当然是当局的忌讳,很快逮捕王祝晨,详查他的政治背景,审问了二个多小时才放出。4月初,听说宁、汉分路北伐,他结业后立即加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领导的“农民运动促进会”,名义为职员,实为大兵,虽然荷枪巡逻、站岗值夜,他认为这是国共合作组织,政治保险性强,这样总比坐监强,同时可以有时间思考一番,权算“充军”。在行军路上,大会、小组会、工作会上,他发现这些领导爱夸大成绩,对民间团体的处理,完全是旧社会的一套:封官许愿笼络感情,领导层中吹吹拍拍、吃喝玩乐,有时还去找妓女,没有一丝新的内容与形式。他很善意提出意见,被气冲冲地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所有的艰辛和危险事都派他去做,有几次很危险差点儿丢失性命。这些人热衷于自己要当什么官,想的是怎样享受,从不想如何革命。(事过三十年后,他才得知他当时背后被视为“傻愚”,被称为“老愚兵”。)正当“农运促进会”高喊“打到北京去!”时,突然接到命令回武汉,回到武汉后,立即宣布解散。一打听,原是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宁汉又合作,但汪精卫还打着“国共合作”的招牌寻找反共的时机,市面上还平稳。6月7日,王祝晨在“党义训练班”(有时就住在党义训练班里)正与董必武同志谈心,他们正在谈得热烈时,忽然周恩来同志(周是5月下旬来汉口,出席第九次中共中央常委委员会(5月22日),25日第十次中共中央会议,周任“中央军事部长”又称“军人部长”)来了。他一见王祝晨就笑着迎上去热情握手说:“没想到老朋友又在这里相见了。我听董必武同志说起您在这里学习,后来又听说您去当了大兵,参加‘农民运动促进会’,怎么样啊?收获不小吧?”董必武笑着插话说:“可真不小,差点成了反革命,有几次差点被处决了。现在是鱼龙混杂时期,旧的势力、旧的工作方法,还在旧的意识下被统治着,我们一



加。”于是他们一同研究起教学问题来。晚上,王祝晨失眠了,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失眠之夜,他坐起来,在记事本中写道:“到广州、到武汉,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我有幸认识了共产党,懂得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就思想方法而论,这是由儒家思想而形成伦理学而实验伦理学、而由辩证法唯物论形成唯物史观。”但“我因跟不上中共的脚步,也绝不和中共闹对立,我左倾和中共握手,但我的脚又不能同中共站在同一立场上,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知何时肃清……”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祝晨带学生南下,先在湖北,后在四川绵阳分校教学,因成都为学校总部所在地,他不时去成都工作。1940年5月25日到28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各党派与民主人士时,王祝晨正巧在成都。他于27日上午又见到了老朋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热情地与王祝晨握了很长时间的手说:“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还好,还好。”二人落座后,周恩来同志亲自把开水端在王祝晨面前说:“我听您的学生告诉我,说您一生不喝茶,不知是否对?”王祝晨笑着说:“我一生最怕湿,所以连茶也不敢喝了,这叫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绳,哈哈!”“王祝晨先生,我要好好谢谢您啊!您为我们送去了一批中华优秀儿女。可是您得要时时刻刻警惕啊!他们什么手段都会用的。”“不怕,他们用的那一套,我都看惯了。现在我只要对那些人说‘把劲用到抗日战争上去!’他们就成了缩头乌龟。”“可还得更注意些好。您的学生告诉我,您已经被特务写入‘黑名单’了。”“我已经感觉到了,有些学生保护我,不会有事的。”“但您还得多注意些好。”“对,对!”“祝晨先生,您对现在的形势有什么看法?”“抗日战争形势已在开始转化对人民有利方面发展。但蒋介石还是在把抗日作招牌,骨子里还是要消灭他心头之患——共产党,人们都看得很清楚。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恶战,蒋介石要把老本全部拿出,看来是非打不行!蒋介石非把老本输光才甘心。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越是要灭亡的政权,越是对自己估计过高,就越易失败;越是脱离人



民,像蒋介石那样,怕人民说话,不敢给人民言论自由,不敢给民主,就更会加速它的灭亡,好像这成为规律了。”“这是真理。听您的学生说,您对总的战争形势有一个估计,说对口作战用不了十年就会全部胜利结束,是这样吗?”“是这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估计在三至五年内发生,到那时战争形势将有重大变化。我预测了一下,原来我估计新的中国将在二十年内诞生,说不定我看不到了,可现在我从现在形势来看,我们用不了十五年,或者可能还会早一些,假设他们弄不死我的话,我想我一定会看到崭新的国家出现!当然,这只是在正常战争情况下,如果中间有意外事件发生,可能会提前或拖后结束。我是给学生们这样讲的。”“谢谢您的分析,您是一位乐观的历史学家,但更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但愿您的分析成为现实,我认为要真正成为现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唤醒民众,与敌人进行艰巨的斗争,您说是吗?”“对,对。我们的民众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是啊!是啊!每一个微小的胜利,其中都有着人民的血与汗,我们的中华民族太伟大了!祝晨先生,我还想问一下,您刚才为什么那样推论?”“为什么?您已经说出来答案了,您不是在说每一个微小的胜利,其中都有着人民的血与汗吗?这个答案我想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人心!现在抗日战争打得非常艰难,是土枪、土炮加石头来打武装先进的小日本,可以说打得很残酷,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这样残酷的战争,就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也是最残酷的,这个最残酷的特征是: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愚昧的较量,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是谁?老百姓看得最清楚,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农民。中国共产党是在努力使民众摆脱愚昧的同时来提高生产力中,与敌人展开拼死的搏斗。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历史上所有战争,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上……”“好一个人心向背!”周恩来同志大步在房间里走着。少顷,“祝晨先生!听您的学生说您最近真的要登报声明退出国民党吗?”“是这样,国民党太过于专制和腐败,我已写好了声明。”“祝晨先生,那我要把您的学生要我

带给您的话说一下,现在国民党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特别疯狂。所以我们请您一定要警惕,依据现在条件来看,在国民党内更可以斗争嘛!这样他们更抓不到什么把柄,您说这样是否更好一点?这就是说要求您再在国民党内待一个时期,按您刚刚的推论,待一个较短的时期。”“这样也好。”“祝晨先生,我们希望您健康地生活,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人民需要您啊!”“谢谢!我会的。”……

1948年9月24日解放济南战役解放全济南市后,周恩来同志在来电报中除祝捷外还特别关心提出询问王祝晨的情况后要上报。25日晨,千佛山的战斗还未结束,姚仲明同志(后为济南特别市市长)与新华社战场记者哈华同志来到王祝晨家去慰问,当时战争虽已结束,但战争带来的破坏尚未来得及修复,硝烟仍存,伤兵还在救护中。(姚仲明同志虽没有跟王祝晨上过课,但听过王好多次课与报告,一直是以“老师”称呼王祝晨,早就相识。)姚把周恩来同志的问候传达后,王祝晨先生就与他们二人谈起了与周恩来同志的相识过程,哈华作了详细的记录,上报了总社,后哈华同志专程来告之走访稿件已在北京见报。(当时济南尚未有报,北京报纸也来不了济南,因时间过久,未能找到该报。)

1949年5月16日,周恩来同志来电请王祝晨去京商讨教育界大事,李澄之同志(当时为济南市教委负责人)陪同前去。到京(当时称北平)后住虹桥宾馆。董必武同志迎接了他们,董必武同志久久握着王祝晨的手说:“没想到啊,我们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啊!他们都称呼起我董老来了,能不老吗!”“彼此、彼此啊!我也成了王老了。哈哈!”二人大笑起来。他们握着手坐在一起谈起了离别后的风风雨雨。不一会儿,周恩来同志来了,他握着王祝晨的手,仔细地着他说:“王祝晨先生,您的预言成为现实了。”“不!比我预计得还快,未出十年就取得胜利……”“对!未出十年,就要出现新的人民民主国家。祝晨先生,按习惯应该称呼您为王老了,对吗?”“对啊!我都过了65岁生日了。”“董老,您看王老还是很硬朗的,对吗?”“当然硬朗,我还没服老,祝晨还是小弟弟嘛!”董



老的话,引得全室人都笑了起来。周恩来同志与王祝晨坐在一起后,有人送来开水,周恩来同志久久望着王祝晨说:“我也很快就要进入六十岁的行列了,我看您没有很大变化。本来毛泽东主席是要来看看您的,建国的事情太多,他过于劳累了,近期医生不准他参与一切活动,只好我一人来了。这次请您来,本应该事先给您打个招呼,但实在来不及,新中国诞生后的教育部需要一位教育家来领导,您是山东著名教育家,在党中央和各部委工作的,我知道的就有近二十位您的学生,党中央提名中希望您出任教育部长一职,不知您是否可以应允?事情太突然,您可以考虑一下再做答复。”王祝晨笑了说:“我猜测中有可能调我来平,但没有想到给我如此高的职位,我想我还是不来的好。”“王老!这可是众望所归啊!您在山东教育界是位有名望的教育家啊!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中,您把生死置之度外,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辛的斗争,给我党输送多少新血液啊!敌人几次要暗杀您,您都泰然处之,新中国需要您这样的教育家来建设新中国啊!”王祝晨仍坦然地说:“周恩来同志!谢谢贵党的邀请,说实话,要是我年轻二十岁,我还可以考虑,但我现在已是六十以上的岁数了,思想已开始老化,不能跟着时代前进,我不能把教育部也被我拖累了,那我不就成为人民的罪人了吗?应该是叫年轻人上来锻炼锻炼的时候了。”“董老,我发现与几位教育家谈话,他们都是对自己特别严格,你说这是为什么?”“教育界对自己的信条是‘身教重于言教’,祝晨,对吗?”王祝晨笑着说:“我是说我已上了岁数,图安逸的思想就增多了,教育可是千秋大业之首啊,这担子实在太重了,我担当不起,再说我对贵党的教育方针虽说是知道些,但总是隔着一座山啊!还是让我在一个小地方伸展我的手脚吧,这样不至于出现大乱子。必武老兄,你得帮我说话啊?”全室内爆发了一场笑声。少顷,周恩来同志笑盈盈地说:“王老,您把我的说客一下子拉到您的方面去了。王老,您可不能谦虚啊!”“不,不,我是非常郑重其事,我历来性格都是这样。”“董老,你看这事怎么办好?”周恩来同志看着董老,董老

笑着对王祝晨说：“祝晨，你说怎样解决好？”“我看，还是叫年轻的上来。”“王老是在走马荐诸葛。”周恩来同志大声笑着接着说：“看来您这样恳切，我们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可这个问题需要很快解决，看来只能从您的学生中选拔了，本来这几位是打算做您的左右手的。现在就研究一下人选后，再拿到中央去作决定吧。”（事后研究的结果人选为王祝晨先生的学生做了教育部负责人）

1954年济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大洪水后的第二天傍晚，王祝晨老两口吃完晚饭，正在说闲话，忽然有人在敲自己住的屋门，王祝晨急忙站起来迎接，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来了，王祝晨忙说：“周总理！稀客，稀客。请坐。”周恩来同志与王祝晨热情握手后又与王祝晨老伴握手说：“这是王夫人吧？您好啊？”王夫人说：“好，好，请坐。”落座后王夫人倒来开水说：“真对不起，他喝开水，弄得全家也没有点茶叶。”“没关系，我也不太爱喝茶，特别到了济南，济南泉水甲天下吗！一喝茶不就喝不出泉水的香味来了吗！请坐，都坐下说话。王老，看来您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是已进入耄耋之期了？”“是啊，已虚度七十四岁啦！”“过去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看现在应改成‘人过八十不稀奇’了，社会主义社会了嘛！您近年来可好啊！”“还算硬朗，周总理。”“王老，请您不要叫周总理，我看还是叫周恩来同志好，同志这二个字就很好，要么叫我恩来，我是一向反对称呼职位的，都是同志吗！王老，我这次来济南市是来看黄河大桥的，这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大洪峰，都很担心这个四十多年的德国货还能不能为咱们社会主义服务，这可是条南北大通道的关键啊！”“怎么样？有人在传说洪水冲得很厉害？”“是有些损伤，大力修补一下可以继续服务。今天晚上就要回去，特意趁机来看看您老，说起济南来，1946年3月2日曾来过济南，那是军调三人小组，日夜打嘴仗，哪里也不能去，当天下午就去了南京，那时如果去了您家那也更会给您增添政治麻烦，这次有点时间来济南，理所当然要来看望您。看来就您老两口在家？孩子们呢？”“孩子们大半都在国外，在



美帝国主义国家里教学，这也是我教育上的失败……”“王老，不能这样说，今天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反对他们的政府站在敌视我国的立场上，他们的先进科技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已经迎接了一批爱国的人材回来了。”“我也已经给老三（指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与数理逻辑专家王浩）写信了，他已准备回国，在北京他的同学们都邀他回来，先叫老三回来，北京马寅初先生告诉我说北大要发函请他来。”“好啊！我回去再询问马老一下。（马老是发了邀请函，王浩正好刚签订了教学合同，等到期满时国内又是“运动”，结果未能成行——笔者）那么您现在一个孩子也没有在身边？”“有个最小的老四，他早已参军，现在去了朝鲜。”“他是什么兵种？”“文艺兵，在部队文工团，从小爱演戏，哈哈！”“哈哈！文艺兵危险性不大，再说现在已经停战了嘛！王老，看来您是与时代同步啊。王老，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安排的？”“早起，听广播，看报，看点新出的书，再就是开会了。”“蛮紧张的嘛！要劳逸结合，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来做？我们有着多年的友谊，您可千万不要客气，有哪些做得不对的地方一定要提出来啊！”“我自己没有任何要求，要提的话，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建设时期，我要提的还是教育经费问题，太少了，不足总支出的百分之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在百分之一以上，我国占人口四分之三是农民，可农村教育过于落后，经费少得可怜，这样下去城乡间距离就要越拉越大，矛盾就会加剧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王老，您是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啊！的确是一位教育家，时时处处关注的是教育，感谢您的提醒。”……一周之后，有人专程送来周恩来同志签名带日期的在洛口大桥上视查时和在大明湖船上的照片。（三个月后省政协常委也每人发了该照片，“文革”中都在被抄家时丢失）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召开，王祝晨当选为代表去了北京出席此会。在会议第三天晚上，王祝晨被邀请到董必武同志家中叙旧，又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一见王祝晨

就大步迎上去与他热烈握手说：“王老，您好啊！看到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与董老就约定一定看望您。”他们坐下后董老对周恩来同志说：“恩来，这次祝晨来京为第一次人代会写了二个提案，一个是农民识字问题，那是他的老本行——教育；一个是建立史志办公机构问题，我认为建立史志问题特别重要，是不是你先听一下？”“好啊！那就先请王老讲一讲，来一个先听为快，不是先睹为快，哈哈！”王祝晨说：“刚才我与必武同志谈起这史志提案，我是这样想：我认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我们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时代，也是先进思想与民主革命的摇篮时期，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我们前赴后继，做出了多大牺牲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们一样，在列强瓜分将要灭亡的清朝后，又是军阀统治，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后又是国民党腐败，使人民坠入更加贫穷的深渊。是共产党起来领导人民，使人民站了起来，这一段内容最丰富的过程还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整个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经历者记载的也比较少，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趁着现在做这些事的人还在，我们请他们口述实录记录下来，不管是革命者或是其他党派和在敌对阵营干过事的领导与知情者，都要写，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完善的历史画卷。认真说起来是有点晚，因为有的已进入老年，我们应该立即成立一个机构，赶紧抢救还来得及，哪怕抢出一点也好，总比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活资料消失好，这是对历史负责，这也是一部非常少得的爱国主义教材，同时又可以以史为鉴，使今后工作上避免走弯路。所以我建议成立一个名称类似文史志的机构，中央一个，各省都要设立类似机构。”“太好了，以史为鉴！您的提案很有价值，这是个重大的提案，我想一定会通过的。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也是我们迫切立即需要做的，你说对吗？董老？”“对，对，这样以来，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将会更加准确，我们的革命史将会更加丰富，也有利于今后的建设，这是个更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他们热切地攀谈起来。……（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该提案。中央成立了“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机构，归属全国政协，各



省市自治区政协与一些部门都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成为全国第一家成立“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单位。)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周恩来同志特向山东打电话，询问王祝晨健康情况，但他不知1958年5月王祝晨开完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回山东后，就在当年9月一次省政协会议上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立即去劳动改造，直到当年10月17日在报纸上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是一桩典型的莫名其妙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冤假错案，原因是需要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就要原有的撤换下一位，换上新来的，于是选中王祝晨。省政协当众宣布王祝晨为“右派分子”并没有申请省委批准后宣布，而是先宣布后打报告，但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时，并不是全体通过，而是少数赞成，这样上报中共中央审批，当然没有被批准。但事实是王祝晨已经在被管制劳动改造，于是就创造出这一新名词来在报纸上公布。笔者曾询问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查遍很多报刊杂志都从未有此名词，表面从字面上看不同于“右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处理上如停发工资、劳动改造(当时76岁)等方面又比“右派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命令拆迁他的私产房屋。山东省委接到周总理电话后立即停止王祝晨劳动改造，并开始发放工资，接着有汽车接送上下班，又按高干待遇给王祝晨，如给保健证、就餐证，并调整了住房、装置电话等等，但从没有在公众场所或私下宣布给王祝晨摘掉“帽子”，也从未补发停发的工资。更是始终没有人告诉王祝晨为什么这样做，询问上级也得不到答案。王祝晨始终不解到底是自己犯有什么错误去劳动改造，一直到去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骚乱开始，周恩来同志下达命令传到山东，“保护一切民主人士”、“民主人士不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为时已晚，王祝晨遭到了抄家与大字报围攻，档案被公布于众。不久王祝晨就得病卧床不起，但医院因王祝晨为“反党分子”拒绝门诊，当然拒绝发给药品，直至重病后抬送医院，医院拒收，不得医治。后虽经其儿媳努力去了她所服务的医院，但为时已晚，入院后



不久不幸去世。

笔者注：关于家父冤假错案一事，直到1978年11月1日，才在济南英雄山革命干部灵堂召开“王祝晨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但未明文宣布王祝晨到底犯有什么错误。

家父在广州的活动材料，多半来自朱道南同志（原为济南一师学生，在王祝晨的鼓励和帮助下去了广州，后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正巧去广州黄埔军校遇到他的老师王祝晨）的叙述，他在196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来济南拍《大浪淘沙》（他为主要作者）影片外景时，特地到我家看望家父时的谈话部分内容之一，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位济南一师学生已忘记姓名，原始记录材料已在“文革”中被抄家丢失，现是追忆，有些材料是家父病中在病床上的谈记录，故时间与原意可能有所出入，敬请批评指正。





纪念周恩来、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既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又是控制南北运输主要干线津浦铁路和近海交通的要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从1937年10月起就大举侵入山东,1939年后,加强了对山东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扫荡”的次数和规模。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41年到1942年,山东根据地处在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还在于山东根据地的工作存在着问题。首先是根据地的整个政治军事工作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的山东分局,本应成为统筹根据地工作的领导中心,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其主要原因,一是缺乏经验,二是分局领导之间团结协助不够,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工作中没有很好配合。其次是工作中存在缺点错误。分局领导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认识不够清楚,一方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有右的错误,对党的独立自主地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方针贯彻不力,对中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足,在反摩擦斗争中又常常表现得被动和无计划,甚至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山区让给顽固派军队,因而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最好时机。另一方面,在处理内部问题上又犯有“左”的错误。在党内和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中乱开斗争会,使一些党内同志和非党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锄奸政策带有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锄奸工作扩大化。同时,群众工作也没有深入,过去曾经蓬勃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也未能予以巩固。群众生活没有认真地改善,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减轻群众负担等中心任务被忽视。

针对山东根据地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事关重大,任务艰巨,便委托刘少奇在从新四军回延安的途中代表中央到山东解决问题。1942年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苏北。4月上旬,到达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所在地东海县朱纂村。

刘少奇到达山东以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山东党政军工作情况,连续找了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等几位主要领导分别进行长时间交谈。之后,刘少奇召集分局委员加上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参谋长陈士渠开了一次谈话会交换意见,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不久又召开了一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和主要干部的配备等问题。随后,在刘少奇的直接参加和领导下,山东分局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全面地总结了山东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为了帮助山东的干部统一认识、提高领导水平,从4月26日起,刘少奇还分期分批地、有针对性地向山东的高、中级干部作了八个报告:《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山东分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从而使山东根据地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转变。

第一,调整了根据地的党政军机构和领导班子,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

当时,山东根据地内部除了主要领导之间团结协作不好以外,地方与军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原有的地方武装山东纵队之间,均存在一定的隔膜。刘少奇到山东后,首先着手处理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经过同各方领导人的反复酝酿磋商,1942年4月,在刘少奇参加的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1)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分局,在分局下设一个军政委员会。



(2)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合并办公。三个机关原有直属队由万余人缩减为 3500 余人,干部统一分配。(3)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第一一五师建制,其余各旅均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胶东第五旅为机动部队(该旅以后也拨归第一一五师)。(4)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分局副书记、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黎玉均驻第一一五师师部与罗荣桓、陈光等一起办公。通过这些组织上的调整,增强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精简了机关,充实了部队,同敌后的战争环境比较适应了。同时,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办公,也密切了相互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二,系统地总结了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山东领导干部的认识。

刘少奇在详细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在高级干部会上就几年来的山东工作作了总结,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武装在山东的困难处境。当时山东境内共有日军 33000 人、伪军 8 万多人,合计 11 万多人。这些日伪军占据着交通要道和政治经济中心,严密封锁津浦、胶济铁路,已使我方大部队无法通过。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队 13 万人,其中反共的有 8 万多人。山东八路军武装有 11.1 万人,其中主力部队 5.5 万人,但由于主力分散,处于对日对顽两面作战且被动应付的局面,使根据地得不到巩固,甚至面积还有缩小。从整个山东的力量对比来看,日伪占优势,国民党次之,而我方则居于第三的劣势地位。在对客观情况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刘少奇向山东的领导干部们指出:“目前山东敌友我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爽快解决问题。但我如果善于应付,可能争取若干好转。如应付不善,并犯错误,则我将发生更大的困难,并要濒于危险。”

对此种局面,当时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在认识上还不够充分和统一,也曾失掉了许多取得优势的历史先机。如第一一五师主

力东征过津浦路很迟,过路以后又未能与山东纵队密切合作迅速争取优势;在反摩擦斗争中,打翻了很多敌人但全都没有打彻底。刘少奇惋惜地说:“过去有过不少的机会是可以利用,充分可能的取得对顽的优势,然而天赐之福,我们未享受到,确实有些可惜。”当然,面前的种种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刘少奇告诫山东领导同志,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局面遮住了眼光,一定要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他说:“第一,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最艰苦的两年,我们不要中途夭折了,无饭吃,吃草也要吃两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第二,要准备好我们一切的条件,调查研究好,干部训练好,经验教训总结好,根据地巩固好,充分准备好,就不会失去先机。在这两年中准备力量,以使两年后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不悲观,不失望,不放下旗帜,不放下武器,不垂头丧气,哪怕什么逆转到来,哪怕什么困难到来,这都是破晓前的黑暗,不久就要天亮。”(刘少奇:《对山东工作的指示》,引自肖华1942年4月26日笔记)

刘少奇的指示统一了山东高级干部的认识,树立了对敌斗争的坚定信念,为山东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三,端正了山东党的工作路线,使根据地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首先是在统一战线方面打开了新局面。抗战初期,山东分局在统一战线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领导上偏软,不够果敢有力。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重申了中央的指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则必须贯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强调党和军队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只有坚持斗争,才能巩固联合,光联合不斗争,就会失去党和阶级的立场。”(转引自肖华《难忘的四个月》,《红旗》1981年第15期)刘少奇特别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方



针,为的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壮大我们自己,削弱和打败敌人。我们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目的就是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问题的中心则在于如何不断壮大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先把自己手中的革命的力量交给顽固派,去乞求和人家联合。所以,我们要坚决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要告诉顽固军,他们要是抗日,我们就愿意和他联合;他们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我们就一定不能允许。”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纠正了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错误,山东的整个对敌斗争形势迅速改观。一部分搞“曲线救国”、坚决反共的顽固派、投降派,在我自卫反击的铁拳下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一些愿意抗日联共的地方势力派(即中间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合作。

其次是在群众运动方面打开了新局面。在刘少奇到达以前,群众工作在山东是最薄弱的一环。对此,刘少奇严肃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东的群众和农救会还没有发生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救会没有权威,群众腰杆子不硬,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认为山东根据地群众工作没有做好,主要的还是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为了搞好群众运动,刘少奇针对实际,专门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报告。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山东分局领导提高了认识,并且很快行动起来:先后发布了多个有关群众运动的文件,组织了两个共有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大型工作团,分赴莒南和临沭两县,朱瑞等领导干部带头下乡。刘少奇也亲自到一些村子了解减租减息运动的进展情况和政策执行情况,并把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派下去参加运动。这样,山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山东根据地在开展党内整风、加强军事工作、总结锄奸工作经验教训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第四,帮助山东根据地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和各项任务。

在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和积极抓好当前工作的同时,刘少奇还从山东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和客观形势出发,帮助制定了山东的党和军队今后的任务。刘少奇分析说:“山东以后的发展,决定于今后三角斗争力量的对比,看谁指导得好,斗得好,团结得好,同时还决定于国际国内大局面的变化对谁有利。”他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内国际的伟大事变。”为了完成这个总的任务,刘少奇还提出了六项具体任务。这些任务,后来被写进山东分局作出的《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中。这一纲领性文件对山东根据地胜利地度过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和以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于1942年8月初离开山东经河北、山西赴延安。刘少奇走后,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山东根据地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文转自山东省情网)



纪念王尽美同志诞辰110周年

臧克家心目中的王尽美

乔植英

同为省立一师校友

1923年夏,臧克家考上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离开家乡,来到济南。到一师后,他得知有一位诸城老乡名叫王尽美,在从事一件很神圣的工作,他感到很神秘,也很自豪。于是就对有关王尽美的一些消息十分关切。那时王尽美虽然已经离开一师,可是为了开展革命工作,还是经常到学校来,所以臧克家就有机会见到心中仰慕的王尽美。

臧克家在他的《诗与生活》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出席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赫赫有名的王尽美同志,就是我的同学,我的小同乡,虽然我进入学校时他已经毕业了(臧克家写此文时不知道王尽美是怎样离开学校的——作者注),但他经常出出入入,在校内做革命活动。我还仿佛记得他的长相,耳朵特别大,同学们亲昵地叫他王大耳朵。他有两句话,像一副对联,传在外边,至今有点影影绰绰:‘自由花鲜血浇出,凯旋门白骨堆成。’我们前期一班从北园搬到校本部之后,我深深感到党派活动频繁,革命空气活跃。”

王尽美于1918年夏天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时,臧克家尚在臧家庄臧氏私立养正初级小学读书,从孙梦星老师那里受到了爱国救亡的教育,接受一些新知识。后来又受到“五四”运动的感召。他和王尽美虽然不在一地,也不相识,认知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被“五四”运动激起的爱国热情却是一致的。那时,王尽美在济南省立一师学习,受到“五四”运动的

影响,积极地投入反帝爱国的斗争中,以他出众的才华,饱满的爱国热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为《省立一师周刊》写的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出:“……出此周刊,作同胞展暮之钟鼓,庶几使梦者醒,醉者苏,协力同心,共谋救国之策。”1921年,王尽美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尽美回到济南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他更积极地投入革命工作,引起了学校有关领导的注意,视他为危险分子,于1921冬找借口把他开除,结束了他在一师的学习生活,从此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

深受王尽美之影响

臧克家在一师学习期间,深受王尽美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确立他人生道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奉系大军阀张宗昌的反动统治时期,革命的烈火在地下运行。济南远在1921年前,就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振千等。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党帮助之下领导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济南有个有名的齐鲁书社,打着书店的招牌,实际上是革命同志集会的场所。工厂里、学校里,都有革命党的组织活动。‘五卅’惨案发生,济南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浩浩荡荡,队伍壮观,我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宏大的大会,手摇小旗,心情激动。记得王深林同志穿着香港布制服,走在前面,像是指挥的样子。市民列在两旁,观者如堵,一声声高昂的口号,喊出了革命群众的力量。”

“我们的学校,算得上是济南的一个革命阵地,同时也是‘五四’新思潮、新文化吸收与传播的一个站口。这两者是息息关连着的。同学们大都如饥似渴地甚至生存活剥地争着读新出版的书。学校成立了书报介绍社,邓广铭就是它的负责人。一天总见他东奔西走为书忙。从北京、上海大批订购图书、杂志,供同学们选择。



社会科学方面的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大纲》、《三民主义》(当时是禁书)等许多种。”他把这个“书报介绍社”称之为山东文化的宝库,思想火种的来源。

追随革命深情缅怀

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臧克家更痛恨那些凶残的统治者,他说:“当时处在这种黑暗反动高压之下,心里感到窒息而愤懑,我以通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揭露这种反动统治的小文,投到《语丝》上去,不久登出来,岂明——周作人还复了信,并加上《别十与天罡》的标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碍于形势,用的是笔名——少全。”

臧克家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王尽美。这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奔向武汉。他用诗句写出了那时的心情:“一万声自由的波涛叫着我,叫我到武汉三镇——光明的结穴处。”

1926年,臧克家前期师范毕业,顺利地考上后期师范,可是,不久便给他的祖父写了辞别信:“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大矣。”完全没有考虑到祖父收到信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就毅然离开学校,怀着满腔热情奔向武汉,投入大革命的浪潮中。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回到家乡,依然积极地参加当地的革命活动,与王尽美的战友王翔千、王乐平、王振千等经常在一起活动,关系相当密切。

王尽美的长子王乃征给臧克家的长子臧乐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记得三六年三七年间,我在翔千家,他请客吃饭,克家老师参加了。我还记得很清楚,翔千发起为烈士后人(主要为王乃征——作者注)的学业募捐(专门印制600份捐启,是翔千亲自筹办并写了募捐启事),第一批捐款的,就有克家老师和王象午等,后因抗战起,就停了。”这件事,臧克家没有对家人提起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王尽美的敬仰之情。

1988年,年已83岁的臧克家为纪念王尽美诞辰九十周年题古绝一首:

党史开先卷,百代扬英名。

暗夜仰北斗,巨手撞晨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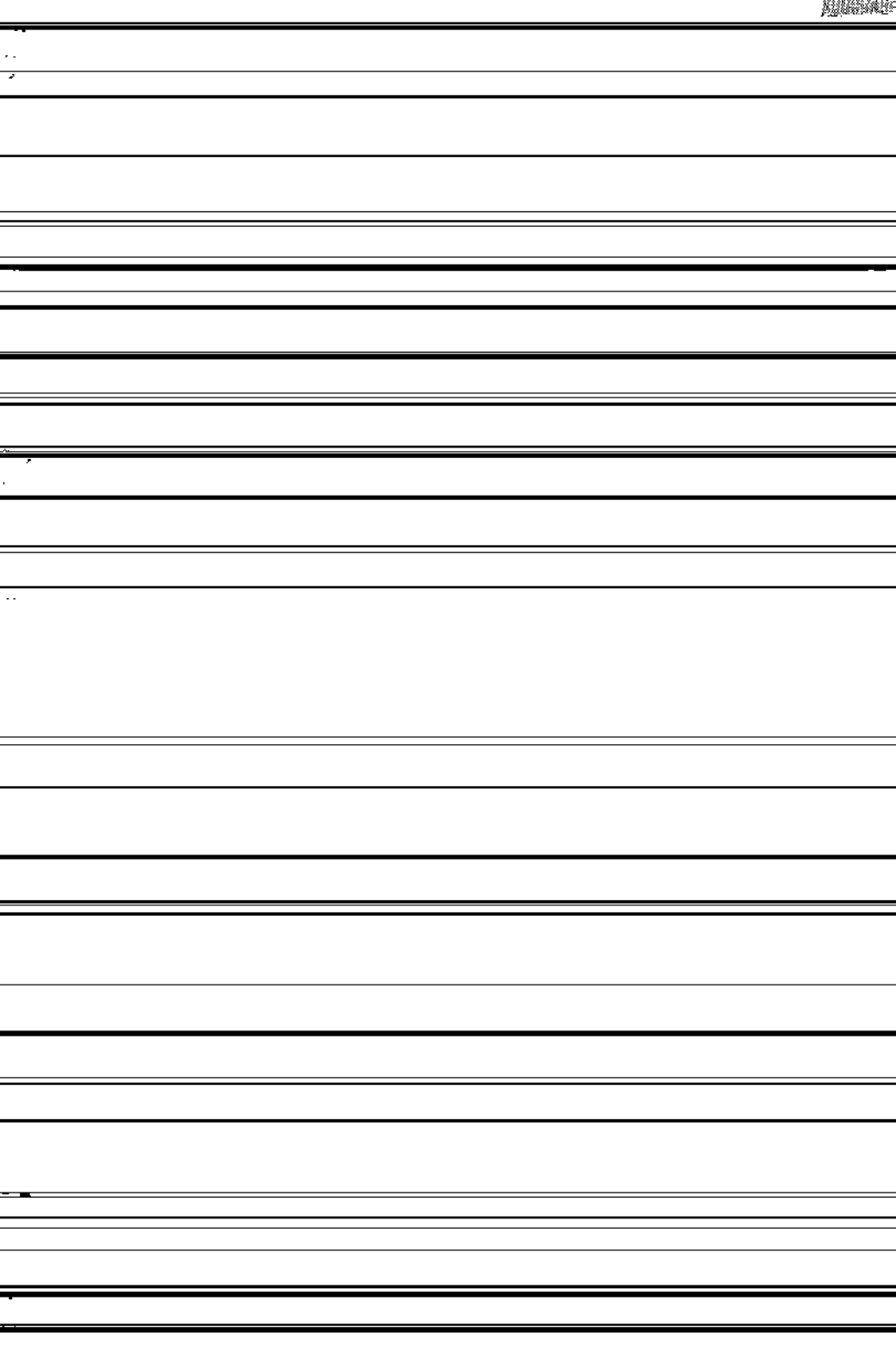
这短短的一首诗,深刻地表现了老诗人对革命先烈的赞颂和缅怀。王乃征还提到请臧老写条幅,他说:“我求克家老师的书法条幅,他亲笔写了董老纪念王尽美的那首诗,现在还悬挂在我的客厅里。这都纪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情谊。”董必武怀念王尽美的诗是:“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臧克家书写董必武的诗,是有深意的。他为友朋书写条幅,在起笔前都是要深思熟虑,反复揣摩的。

王尽美生平

王尽美1898年6月生于诸城北杏村一佃农家庭,家境十分贫寒。1918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尽美被推举为省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领导一师学生闹学潮。后来又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秋,与省一中学生邓恩铭等发起成立了以“新思潮互相砥砺”为宗旨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先后在《励新》等刊物上发表了《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和《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3篇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猛烈地抨击了旧教育制度的黑暗,大声疾呼要对旧教育进行改造,论述了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学与用相结合的教育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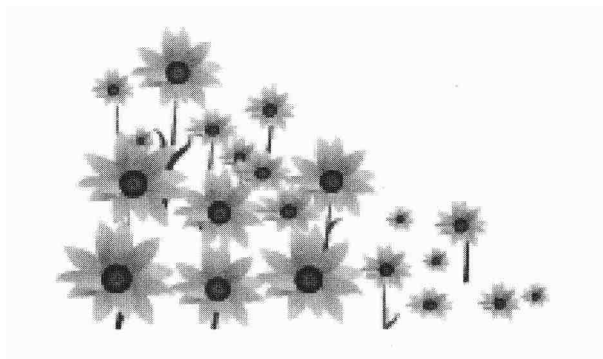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还先后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主要负责人。1921年7月,和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



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运动。1924 年底,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委派王尽美等人士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在山东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1924 年 11 月,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尽美被选为书记。1925 年初到青岛,一方面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公开活动,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促进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一方面与青岛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还与邓恩铭一起领导了青岛及胶济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领导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

王尽美为革命呕心沥血,在 1924 年 10 月曾染肺结核,但仍忘我地为革命奔波。1925 年 4 月病情恶化,不幸于 8 月 19 日在青岛与世长辞。党组织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安葬,1959 年迁葬于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

(本文摘自《大众日报》第 23713 期 2008 年 4 月 16 日)





纪念平阴解放 60 周年

铭记历史 继往开来 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新平阴

孙积港

今天，是我们平阴解放 60 周年纪念日。60 年前的 3 月 12 日，在人民武装的打击下，平阴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溃退，平阴人民获得了解放。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了平阴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同时也向那些为了平阴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峥嵘岁月一甲子，沧桑巨变六十年。刚刚解放的平阴，满目疮痍，百废待兴。1949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707 万元；全县仅有少数的手工业作坊，产值只有 33 万元；县城只有两条主要道路，且全是土路。60 年来，平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平阴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7 年，全县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3.01 亿元。农业方面，生产条件显著改善，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玫瑰、畜牧、蔬菜、林果四大主导产业比重达到 74.2%，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35 家，无公害品牌达到 20 个，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节水增产重点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等荣誉称号。工业方面，产业结构日趋优化，规模快速膨胀，竞争力不断增强。培育壮大了



机械装备、医药化工、食品加工、水泥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138 家,实现销售收入 166 亿元,利税 23 亿元;市以上名牌产品达到 17 个。城乡建设方面,城市布局日趋优化,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综合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县城形成了“十纵十横”的道路框架,实现了硬化、绿化、美化、净化、亮化目标。村村通公路、村村通自来水等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城乡环境进一步改善,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收入持续增加。2007 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68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290 元。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县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先后荣获“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县”、“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平阴解放以来的 60 年,是平阴人民扬眉吐气、创造幸福美好生活、谱写富裕进步新篇章的 60 年;是社会生产力空前解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日益丰富的 60 年;是各项社会事业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 60 年。60 年来的成就充分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揭示过去,历史修正现在,历史指导未来。党的十七大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到 2012 年,我县要实现生产总值 223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7 亿元,城市功能全面提升,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公民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普遍提高的奋斗目标。美好愿景,玉汝于成。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必须紧紧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时不我待的工作激情、坚定的信念、拼搏的精神、务实的作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将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注重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在工业经济方面,要从我县的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发展阶段的特点规律出发,坚持“新型工业强县”不动摇,狠抓技改膨胀,做强龙头企业;狠抓延伸配套,做大产业集群;狠抓科技创新,打造知名品牌。强力推进招商选资,坚持科学招商,实行理性选资,提高招商层次,增强招商实效,推动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招大引强转变,促进工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要突出抓好农业的产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和科技化,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繁荣农村经济,致富农民群众。在城镇建设方面,要围绕加快城镇化进程这一目标,以创建省级园林城市为抓手,完善载体功能,创新运营机制,加快建设推进力度,展示城市发展新形象。同时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努力提升传统商贸业,加快发展房地产业,做大做强旅游产业,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要立足社会和谐,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牢固树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民生为先”的理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建设,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全县人民。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推进“就业、就医、就学”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致力于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进一步提高各类保障的覆盖率和保障标准;致力于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着力完善社会救助、扶贫等各项制度,形成稳定长效的保障机制和体系;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优化社会治安环境和法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要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建设新平阴,必须建设一支观念新、视野宽、能力强、活力足、干劲大,能够肩负起领导改革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各级干部要不断解放思想,提升境界,增添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要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增强工作的责任感;要加强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要狠抓落实,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具体抓、抓具体,一个

矛盾一个矛盾地破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克服,确保各项决策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实效。

回顾平阴解放 60 年来的辉煌历程,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的光辉前景,我们信心百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平阴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共平阴县委书记)





回忆录

和谦初一起在济南

张文秋

“谦初的斗争意志很坚强,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周恩来同志当年对刘谦初烈士在狱中斗争的赞誉。刘谦初不愧为一名值得学习的共产党员,党的忠实儿子。他牺牲虽然将近五十年了,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却一直在怀念着他。谦初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甚至他的一言一行,都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谦初是山东平度县刘家莊人,一八九七年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原名刘德元,号乾初,参加革命后,改名谦初。他在幼年即非常勤劳,经常帮助父亲在田间劳动。他求学期间,正值我中华民族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势力压迫,处于灾难重重之际,这时他就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革命要求。十五岁那年,他在山东知务中学读书时,参加过高密县农民组织的义勇军,投身于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因斗争勇敢,曾获得一枚奖章。后来,他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他转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秘密与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学运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很快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他和进步同志董秋斯、张采真、于毅夫等,成立燕大文学会,接办《燕大周刊》,并经常在周刊上发表进步论文。他善于进行政治宣传,演讲时思想观点鲜明,感情充沛,气势轩昂,言辞简练,宏辩滔滔,很能鼓动群众;他所写的文章逻辑清晰,思想性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正因这样,谦初的行动激怒了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决定把他开除燕京大学,这一决定引起了拥护“燕大文学会”的学生、

职工的坚决反对。谦初不但没有屈服于校方的决定,反而领导学生展开了罢课斗争。最后校方担心把事态闹大,只好撤销了这一决定。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谦初几乎天天跑到群众聚会的地方去演说,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春天,他到达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我们从此分了手,后来得知,他开始在岭南大学教书。这期间,他仍然积极地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开展宣传工作,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后来,他参加了北伐,和董秋斯等同志一起到达武汉,在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工作。他担任政治部的刊物《血路》的主编,继续发表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文章。当时,在北伐内部围绕着中国革命应由谁来领导的问题,斗争很激烈。国民党认为中国革命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谦初勇敢地站出来和他们进行争辩,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工人阶级来领导的主张。为了从现实中找到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论据,他曾到武汉附近的农村,搞了一段农民运动,进行了一番社会调查。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叛变革命,成立了南京政府,汪精卫在武汉成立了武汉政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向蒋介石妥协投降,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起初,根据党的指示,谦初准备去江西参加南昌起义,但由于蒋介石封锁了长江,卡断了交通,他便和大部分同志根据中央分散潜伏的指示,达到江苏,转道到了上海。那时向忠发担任中央书记,谦初从此便被分配到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去了。

一九二八年,山东发生了济南惨案,省委也遭到了第三次大破坏。党中央考虑到谦初是山东人,熟悉山东的情况,便把他从福建调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派他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去恢复山东省的工作。于是,谦初到了济南。

一九二九年四月,根据工作需要,党把我由上海调到了山东,担任省委机要技术工作和妇女工作。一起调来的还有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荣同志。我们由上海坐轮船到青岛后,党维荣同志留了下



来。只在由青岛到济南的路上有交通员在暗地里护送我。当火车快到济南的时候,交通员对我说:“快到了。我不能跟你一道走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你的,他姓黄,穿着灰色羽纱大褂,戴黑礼帽。”说到这里,交通员靠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你们的接头暗号是:找‘陈孟君’!”

火车到达济南北关车站时,我便把头伸向车窗外,四处观察。车站上的人很多,一时很难找到跟我接头的人,我只好拿起随身携带的行李下了车,留神向四下里寻找,看了好大一会,也没有看到接我的人,我心里想:在人头济济的人群里,让我到哪里去找穿灰色羽纱大褂的自己人呢?心里真有些着急。

我刚走了几步,忽然,有人喊了两声:“陈孟君!陈孟君!”我站住了。这声音好熟啊!我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灰色羽纱大褂戴黑礼帽的人,正朝我走来,这人多象谦初呀!我一时呆住了。再仔细望望,果然是谦初。我又惊又喜,差点喊出声来,又一想:这真的是他吗?这是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两年来,我是多么想念他啊!

我正在发呆,他走到了我的跟前,一双有力的发热的手把我紧紧地抓住了,说:“唉!到底是把你盼来了!”

这一切来得多么突然,不知怎的,我的眼泪一刹那间和瀑布一样流了出来,但又怕别人看见产生怀疑,只好使劲地忍住了。停了一会,他说:“走吧!我们回家去吧!”我点了点头。他忙提起行李,走了几步,又转过身去,招了招手。立刻过来一辆双轮马车,原来他早早准备好了,而且也早看见了我,只是怕有人暗中盯梢,才没有马上过来叫我。

我们坐上了马车,因马车夫离我们很近,我们什么话也不能讲,只是互相对看看。马车通过了一条大街,谦初忽然叫马车夫停住,他敏捷地跳下车去,在一家店铺里买了济南乡下的土产品“干鱼”和“地瓜干”。这是他准备送给房东的,借以证明我是乡下女人,刚从家里来。这对掩护机关是很必要的。我心里暗想:谦初想

得真周到，他真会做保密工作呀！一会儿，他对我说：“快到了！”

他的话音刚落，马车走到了钟楼寺街的一个大黑门前。谦初对车夫说：“到了！到了！”我们便下了车。他付了车钱，直到目送车子去远了，又机警地向周围看了一下，见没有人，才一边取手绢擦汗，一边对我说：“总算把你接到家了！”

我提起箱子，正要往大黑门里走去，他连忙轻声说：“慢走！慢走！还没有到呢！”他用手指了指和我们来路相反的左边一条马路说：“在那里呢！”于是，他转回身带着我穿过了一条马路，又转了一个弯，进了东西菜园子街。当我们走到一家黑大门前时，他停住了脚步，往身后扫视了一下，指着大门说：“进去吧！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我们两人一道走了进去。前院的房屋是房东住着，院内静悄悄。谦初拿出钥匙，打开了后院的门。后院也很整洁，北面一排三间正屋，两边是东西厢房，后院比较宽大，院里有花有草，四周还有走廊，院墙旁边有一个后门，直通一个偏僻的小巷，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环境最适宜谦初的工作。房内的陈设很简单，却给人一种温暖、安静的感觉。

我坐下之后，谦初对我讲述了自我们离别以来的情况。他还告诉我，当时，山东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陈调元和汪精卫改组派统治着山东，对革命的摧残很厉害，省委机关已遭受三次破坏。谦初说，他来到济南后，就租下了这所古老式的民房，这就是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

谦初在这里的化名是黄伯襄，对外人讲，他是在齐鲁大学教书。这时我才明白，是为便于应付环境，保护机关，同时也为了照顾我们的关系：党才把我调来济南，叫我化名陈孟君，装作家庭妇女。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没有职业和家眷是租不到房子的。尽管这样，还得时时警惕，经常注意周围环境的变化，提防警察突然闯进门来检查，甚至一听到门响，就连忙准备应付敌人。在我们的西屋，有一个临街的窗户，窗上总是放着一盆花，或是一条肥皂一挂辣椒，作为警号。一有情况，就马上把东西拿掉，暗示来联系的同志不



要再来。西厢房的墙上有一个壁柜,平日用一幅大字画遮住,里边可以临时放些秘密文件,谦初还在东厨房内的水缸底下掏了一个大洞,洞内放置了一个瓦缸,用以存放重要的秘密文件。

我来济南之前,谦初是一个人在外面吃包饭的。我来之后,自然不能再在外边吃包饭了。为了更像个家庭的样子,第二天,我们一起上街去买东西,我见他总是穿着那件灰色大褂,一条藏青西服裤,一双黑皮鞋,便让他换换衣服再出去,他却对我说:“不要换了,我这身衣服,是常到工人群众家去穿惯了的,俭朴些好!”于是,我们俩便经过后宰门,通过芙蓉街,西门大街,来到了纬四路一家百货商店里。因我们的钱不多,只简单地买了点厨房的用具。

在回来的路上,谦初对繁华的西门大街毫无浏览之意,他边走好象边在想什么。当走到一个路口时,他忽然对我说要我跟他去看一个朋友,他说这是一个工人同志,生了病,生活很困难,一定要去看看。他领着我转了几个弯,穿过了几条小巷和一片荒僻的大空场,来到了一排矮矮的破旧的平房前。谦初轻轻地敲了敲门,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开门走了出来,她一见谦初,忙说道:“黄先生,你来了。”接着就让我们往屋里坐。屋里很暗,我进去后定了一会神,才看见炕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病人。在旁边墙跟下,一个小凳上,坐着一个青年妇女,抱着一个在吃奶的孩子。那个卧病的青年一见谦初进来,急忙伸出两只手拉住他说:“黄先生,你来啦!我真是想你呢!”谦初在病人的炕边坐下来,忙问他的病怎样,是否好些了。于是,两人便谈起话来。

原来这位年青人姓周,是个工人,因为搞工人运动,被工厂开除了。失业了很久,又病了两三个月,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谦初听他讲完病情后,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额角,说:“还发烧呢!”说罢拿出了十五块钱交给了老大娘,说“我这儿有点钱,你拿去买些粮食,再给老周抓几付药吃。如不够用,过几天我还可以给你们再想些办法,千万不要着急呵!”

老人家接过钱,坐在凳子上,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说:“黄



先生，我们怎好老是花你的钱呢？真使我心里不安呀！”谦初说：“别客气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只要老周病好了就好。老周是为穷人解放才被开除的，我怎能不管他呢？”谦初又安慰了老周一阵，要他好好养病，又低低地同他讲了几句话，只见老周连连点头，然后我们便走了出来。老大娘和那年青妇女连连致谢，把我们送出门外。直到我们走出好远，还看见她们依依不舍地张望着。这时，谦初才悄悄对我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地下关系，以后你就负责和他联系。”

在济南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比较紧张，但却十分愉快。谦初比我大六岁，他总是象对待小妹妹一样照顾我。他精力旺盛，体格结实，那红润的脸上总是显示着自信和乐观的神采。每当一天紧张工作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畅谈各自的过去，憧憬美好的未来。

谦初还非常喜爱大自然，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们游览过趵突泉，也曾泛舟在大明湖……记得谦初曾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大明湖多美呵！真可谓‘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将来到了我们的新社会，比现在更要可爱得多呢！”陷入了沉思，尔后叹了口气，说：“你看我们祖国这样大好的锦绣山河，现在却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践踏，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呵！咱们一定要增强斗争意识，使革命早日成功！”

谦初平时说话不多，一有空，就认真地考虑工作。他对每个问题都做到细致周密的研究，对每一个细节都不轻易放过。他对每一件事，只要一经决定，就立即行动。他胆大而心细，对工作注意妥善安排；他平日很爱读书，经常到半夜之后才睡觉。他对学习、工作充满着热情，生活严肃而有规律。他每日刚微明就起床，阅读文件书报，白天赴各工作处所，办公开会；晚上闭户学习阅读文件，研究问题、写文章，直到深夜。他对党的文件，慎之又慎，每当阅后即严密收藏；他写文章，用多个笔名投往当时的多种报刊，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他就是这样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着。



谦初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为革命不畏艰险的斗争精神,令人记忆尤深。一天下午,谦初和省委组织部长老王同志一起从外面回来。他们进门后,就到西厢房去了。随后我也跟着走了进去。老王同志拿出一大包东西,谦初便对我说:“这包东西交给你,今晚七点钟送到老周那里去!”我接过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传单。于是我连忙把它放进了壁柜。谦初问我:“那地方我曾带你去过一次,你还记得吗?”我想了想回答:“不十分记得了,还记得个大概。”谦初说:“那样,我给你画个路线图吧!”老王见谦初要向我交代接头地址,便对谦初说:“我在院子里等你!”说着走了出去。我知道老王同志和老周同志不发生工作关系,因此自觉地走开了。

谦初给我交代了地址,又对我说:“你先弄些饭吃吧!七点钟要按时送到,那里有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在等你。告诉你:今晚十二点以前,一定要行动起来!”我点了点头,他又严肃地叮嘱了两句:“你一定要按时送到,并要注意安全!”说完,他拿起帽子就走。刚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今晚十二点钟,我如不回来,你就把文件烧掉。明早如果还不回来,你就准备赶快回上海找党去!”当时我不知道他要出去干什么,因为保密关系又不好问,但心里很紧张,忙说:“你放心吧!你自己也千万慎重一些!”这时,老王同志从院子里进来对谦初说:“我明天清早就动身离开济南,到了目的地,我给你来信。假若接不到你的回信,我就等候在那里。”谦初对老王同志说:“需要你回来时,我给你写信。”他们二人一面说着一面由后门走了出去。

这天晚上,我完成了转送传单的任务回到家里,已经十点多钟了。我没有吃饭,就站在院子里等候谦初。院子冷清清的,我一个人不安地来回踱着步,隔不一会儿就打开后门看看,小巷子里黑漆漆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十一点半了,谦初还没有回来,我心里有些急了。墙上的挂钟的嗒的嗒地响着,我一秒一秒地数着,十二点了,谦初还没有回来,我不禁在心中自问自答:烧文件吗?暂时还不能烧,这些文件来得不容易呀!再等一会儿吧!再等半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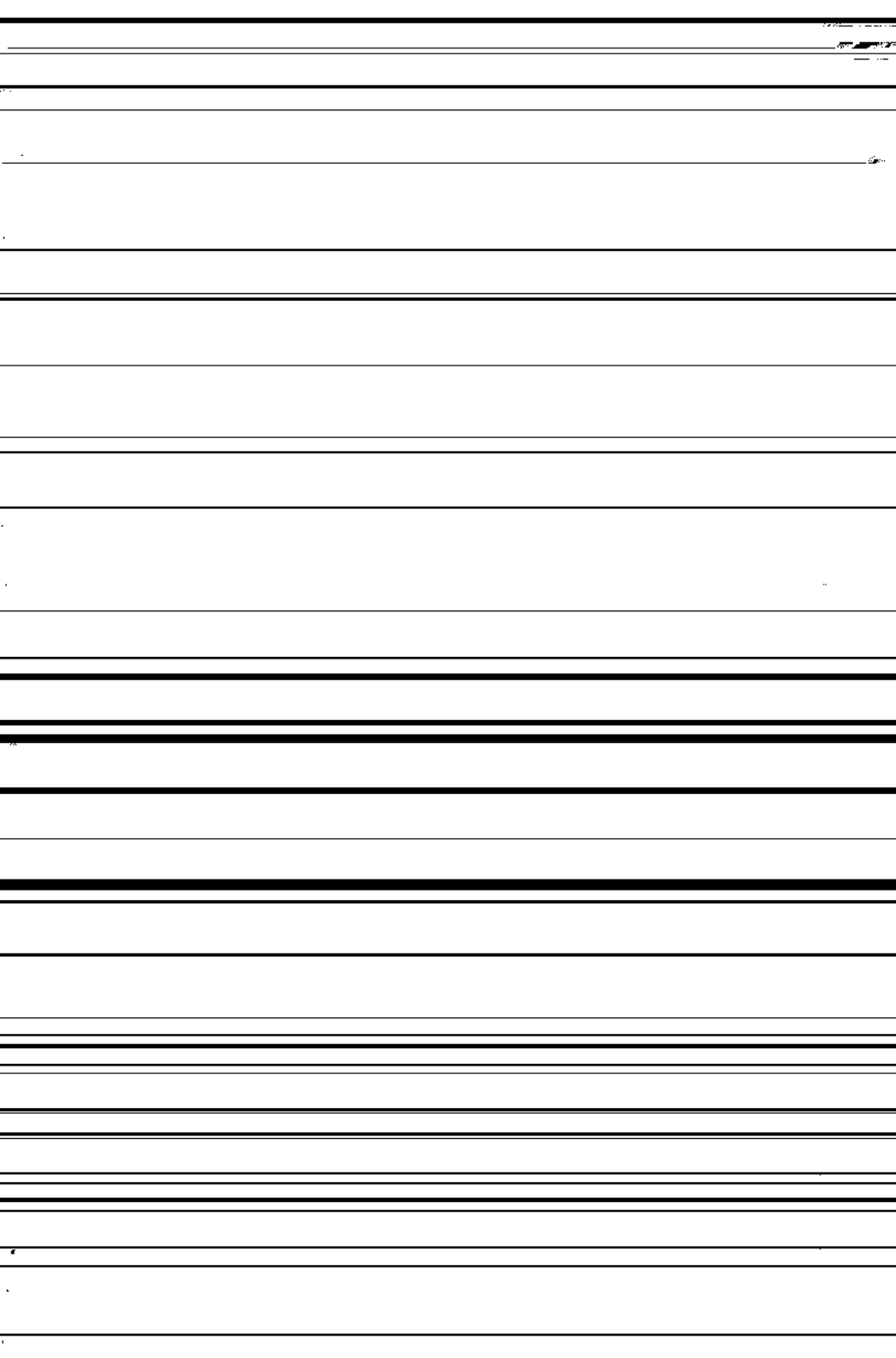
时,不回来就一定烧!又过了半个小时,谦初仍然没有回来,我心里慌了,想:“谦初可能被捕了!”想到这里,一阵心酸,忍不住眼泪涌了出来。就在我毫不犹豫地走进厨房,准备去拉开水缸取文件烧毁时,门声响了,敲门声很轻,而且很有节奏,听到这熟悉的敲门声,我急忙打开后门,谦初走了进来。

谦初象往常一样平静,进门后就微笑着问我:“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我回答说:“完成了!”他一面说“好!好!”一面向他的西厢房走去。一进屋,他就坐在桌子前边写了起来,写了一会,微笑着对我说:“还没吃晚饭呢,做点饭吃吧!”这时,我才想起我也没吃晚饭,觉得自己肚子也饿了呢!

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谦初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他组织罢工斗争。于是,他决定到博山、潍县、青岛等地去组织总同盟罢工。他临走时,手头一个钱也没有了,他只好包了几件衣服,送进了当铺,当来的钱,留给了我一点,余下的作他的路费,他交代好以后就走了。

谦初走后,一天,下着小雨,我要到顺贡街省委秘密机关开会。当我走近机关时,看见窗前作为警号的黑礼帽依旧挂着,便向里面走去,哪里知道机关已在当日清晨遭到了破坏。我掀开帘子见满屋子警察,手持枪支,正在翻箱倒柜搜查东西。我心里一惊,刚想往外退,他们一拥而上,几支手枪对准了我,就这样,我被捕了。我被戴上手铐,推进了一辆铁笼子汽车,押进监狱里。

我在狱中仍然时刻惦念着谦初,心里时常在想:他现在在哪儿?是否安全?后来,才听到谦初对我说,那一期间,他的工作异常繁重紧张,他离开济南后,先是在博山、潍县布置好工作,又到青岛组织总同盟罢工。待青岛的总同盟罢工开始后,他才回到了济南。那一天,他提着一个小竹篮,装作从亲戚家里回来的样子,走进家门。刚走到前院,就看见后院门倒锁着。这时房东看见他,对他说:“黄先生,她从七月二日去趵突泉买东西,就没有回来过,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你回来了正好,快去找找她吧。”经房东一说,谦



以后没有照过相，恐怕是敌人弄到了我在北伐时期的照片。”这时，谦初紧紧地靠着我的肩膀，低沉而有力地说：“你的理智哪里去了？在敌人面前，我们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呵！”我擦了擦眼泪，抽咽着：“你如果牺牲了，我准备同你一道去牺牲！”这时，谦初注意到两个把门家伙发现我们在讲话，便连忙改换口气说：“你不要这样，孟君！我们一切都要为妈妈着想，万一我死了，你还要为我来孝顺她老人家，不要辜负妈妈对我们的教育呵！”我知道谦初说的“妈妈”指的是党，我一边听着谦初的嘱托，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谦初再次劝告我：“应当理智一些，坚强些！”听了谦初的话，我连忙擦干了眼泪，说：“你尽管放心吧！”

谦初第一个被叫进去过堂。半个多小时后，他被两个士兵架了出来。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脸被打得青紫红肿，血肉模糊；光着脚板，头发、脊背、屁股都是血，血顺着裤管往下流，每走一步都留下一个血的脚印。我一想，心都要蹦出来了，我一下扑上去，抓住了他的胳膊。这时两个士兵把我拖开了，并用枪托打我，把我推倒在地下。谦初勉强挣扎着站住了，他镇静地对我说：“没有什么，不要紧，今天他们打了我，将来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教训他们的。”两个士兵拖着谦初走远了，走到门口，他又吃力地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孟君！不要为我担心，记住我的话，保重自己。”直到门外，他还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

谦初在狱中表现得十分坚强，尽管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他都丝毫没有屈服。有一次，他在让狱卒转交给我的一包糖饼里，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四句诗：“无事不必苦忧愁，应把真理细探求。只要武器握在手，可把细水变洪流。”我仔细琢磨着这诗句的含义，进一步增强了坚持狱中斗争的信心。

后来，我被敌人当作嫌疑犯释放了。由于党的安排和帮助，我回到上海，找到了中央，通过一些关系，可以和谦初来往通信。我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时，党曾几次设法营救谦初同志，但都没有成功。在这期间，党组织通过我给他寄去了一些衣物用品和



书籍,谦初仍时常给我写信,通过我向党报告他在监狱中的情况。有一次,他怕我难过,就请董秋斯同志转交给中央一封信,信中说:“事已定局,没有挽救的可能,请不必进行挽救工作。”并说:“我心里很平静,正在加紧读‘社会进化史’,争取时日,多懂一点真理。”后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你为我转告妈妈,不要为我再花钱了。妈妈的钱也是困难的。我在这里可以好好地安心看书,把监狱当成学校,多学一点真理,精神也是愉快的。并告诉朋友们,我很好!”

谦初在狱中期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那时还在上海中央工作,他对谦初非常关心,叫我好好照顾他,多写信去安慰他。并亲自到我所在的上海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通讯处,看谦初从狱中给我寄来的信,看完以后,周恩来同志赞叹地说:“这真是铁窗风味呀!”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批准给我一个月的假,去山东济南监狱探望谦初同志,并给了我一百块大洋,让我转交给谦初和其他同志在狱中使用。我从济南探监回到上海后,周恩来、任弼时等许多中央的同志,都来向我询问狱中的情况,对谦初非常关心。

后来,山东省委到上海党中央请示工作时,我听他们讲:谦初在狱中,一方面组织同志们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翻译了一本《反杜林论》,并组织过一次越狱,但没有成功。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上午八时,山东军阀韩复榘将谦初等已判决和未判决的二十一名革命同志,押解到济南纬八路刑场枪杀了。谦初牺牲时仅有三十四岁。他牺牲后不久,监狱的地下组织给我寄来了他临牺牲时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现在临死之时,谨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望你谨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地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

五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我和谦初一起在济南的那段斗争的岁月,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我想: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蓝图,不正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鲜血画出来的吗!

50 年前济南市委办公大楼建设纪实

王子侠

虽然离开市委办公大楼已经多年,但每当我走过这座古朴、美观而又敦实的建筑物,每当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时,近半个世纪前,筹建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大楼的情景便跃然于眼前。

在分散办公的日子里

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随即,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市人民政府和警备区司令部等党、政、军机关相继进入市区,接管这座英雄的城市。

但是,市委机关进驻市区时,却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

进驻济南的第一天晚上,特别市委的全体工作人员就在原国民党济南绥靖区司令部驻地的地板上,席地而眠。

第二天,市委书记处、机要处等搬进了原经七路 83 号院,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则暂时安置在现在的公安厅院内,市委机关算是有了临时的落脚地点。

1949 年春,中共山东分局、省人民政府、山东省军区等机关向济南市搬迁,为了迎接领导机关的到来,济南市委积极为其准备办公和宿舍用房。在当时,找寻一处比较合适的办公场所并非易事,于是,市委便从自己有限的办公处所腾出了一部分房子让与省级机关,而自己的一些部门则辗转迁移,搬到了条件更为简陋的地方。



道经七路,面对从火车站直通市委的纬三路(规划中的纬三路正对市委大楼中厅),交通四通八达,极为便利,有利于市委与外界联系。

——开发较少,拆迁容易。这一区域原是安徽义地,坟墓林立,荒草丛生,除墓地北侧有几间平房,墓地西侧有一省广播电台干扰台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未开发的荒地,因此,拆迁较为容易。

——地下有人防工程。在国际局势还比较紧张的 50 年代,济南市在此地下建有 3 层楼房规模的人防工程,里面通讯设施、警报系统一应俱全,一旦战争爆发,这儿是市委领导的理想指挥所。

地址既已选定,人们在翘首企盼着市委办公大楼的破土动工。

设计匠心独运

走进市委办公大楼,那宽敞的大厅,高高的举架,良好的通风设施,完备而合理的电器布置……你很难把这一带有浓郁现代化气息的办公大楼与建国初期的时段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济南市委办公大楼的设计在当时是一流的,是超前的,是有预见性的。

市委办公大楼的设计单位是当时全省最具权威的省建筑设计院。

工程建设,规划设计是龙头。市委办公大楼不同于一般的办公楼,它直接代表着济南市的形象。因此,设计者不但要考虑其结构稳固,造型美观,还要尽可能体现党政机关办公楼的严肃庄重特色。建筑设计院接此重任后,专程派设计骨干到上海,遍访了大都市各种风格的高楼大厦,借鉴比较新颖的设计样式,吸取了一些先进的设计经验。回济后,设计者博取众长,加紧构思,很快,一张颇有气魄的蓝图便初见端倪:

外形:楼层地下 1 层,地上 7 层,局部 5 层,总建筑面积 1.66 万平方米;内部:设中央空调、电梯,为保持室内空气清新,进、排风分流,整座大楼按 7 度设防,可抗 7 级以下地震。



设计方案初稿确定后,设计院又对整座大楼的整体布局、建筑造型、内部空间的处理以及采光、照明、空调系统的设计等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和反复的修改。最后,一张满浸着设计者智慧和汗水的市委办公大楼规划图终于拍板定案。

市委办公大楼设计图无论是总体设计上的恢弘壮观,还是局部构思中的精巧新颖,都在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市委办公大楼是一思想解放、独具匠心、具有长远预见性的上乘之作。

筹材历尽艰辛

市委办公大楼的设计蓝图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但是,把这一切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还有一段异常艰难的路。

一流的设计必须要有一流的施工相配合,承建市委办公大楼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当时享誉齐鲁的济南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简称“市建筑一公司”)的肩上。

1959年12月,市建筑一公司调集精兵强将,浩浩荡荡地把队伍开到了施工现场,一时间,车辆穿梭,机器轰鸣,市委办公大楼破土动工了。

开工伊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部分建筑材料紧缺。钢材、电梯、电缆、电话线等在当时都属国家统配部管物资,不能随便购买,而这些材料济南不能生产,山东其他城市也不能生产,这一难题重重地摆在了市领导面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楼要顺利崛起,建材按时到位是关键环节。

为了保证建筑材料和设备及时供应,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的正常进行,我受市委办公厅委托,打点行装,带上建楼需要的列有各种金属材料规格、型号、数量的清单,踏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请上海市计委和冶金工业局协助解决。经过多方努力、协商,最后与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及有关厂家达成协议:用我市生产的两

吨生铁调换一吨钢材,根据需要,由上海市计委负责给予调剂各种型号、规格的钢材,并按照图纸代为加工成成品。我返回济南后,又派专人常驻上海,督促其按时生产和办理托运事宜,以确保建筑设备和材料及时运抵济南。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市场还很不发达的年代里,除一些国家统配物资不能购买到外,还有一些非重要物资在市场上也难以买到。记得当时建筑用的白水泥,美观、硬度高的白石子等都属紧俏物资,很难买到。我再一次背起行囊,披星戴月,风雨兼程,远行镇江、南京,跑工厂,跑矿山,跑车站,终于,一车车带着南国气息的白水泥、白石子千里迢迢来到了泉城济南,成为了市委大楼的一分子。

就这样,虽历尽艰辛,市委办公大楼的建筑用材还是保质保量地如期运到了施工现场,确保了工程的正常进行。

施工精雕细琢

市委办公大楼的设计是一流的,建材是一流的,施工质量更是一流的。

今天,建筑行业出现的一个个“渣滓工程”让人听了触目惊心,类似虹桥的劣质建筑也时有耳闻。而市委办公大楼的质量却有口皆碑,虽历经近半个世纪风雨,仍巍然不动安如山。那么,在施工条件、管理手段远不及今天的当年,市委办公大楼靠什么创造了一流的质量?

靠负责的态度,严格的管理,高度的责任心!

当时,从普通施工工人到负责整个项目的领导人员,心里都有一个信念:决不把质量大计当儿戏,处处严把质量关:

技术人员对建筑材料精心筛选,严格把关。当时,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原材料,一律要进行精心的检验:对建筑用水泥,必须重新化验;对黄沙的硬度、拉力,对红砖的压力,对钢材的韧性、强度都

西藏的历史与现实

西藏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地区,现在她早已揭去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世界面前。她正经历着从极端落后的中世纪状况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世人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仍然知之甚少。于是一些曾经侵略或试图侵略她的人高喊,她受到了侵略;一些曾经完全剥夺了这一地区人民人身自由的人呼叫,那里人民的人权受到了侵犯。谣言、歪曲、猜疑、误解……织成一层烟雾又笼罩着这个地区。

要了解这个地区的真实情况,还是要看事实。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实摆出来。

一、西藏的主权归属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元朝(公元 1271—1368 年)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 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1271 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 1279 年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继汉(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 年、1287 年、1334 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有关于这三次调查的详细记载。

明朝(公元 1368—1644 年)

1368 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并规定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1403—1424 年在位),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大小派别各踞一方,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对于入贡期限、来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至今西藏有的喇嘛寺内还保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清朝(公元 1644—1911 年)

1644 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 1653 年、1713 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

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朝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规定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噶伦不得与外方通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另外对犯罪者的处罚，也都要经过驻藏大臣审批。

据统计从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



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轶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人藏致祭，并批准势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1

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



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二、1959年武装叛乱是怎样发生的

和平解放前,西藏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又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

央的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不搞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3、4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叛乱分子把他和妻子抓起来,吊打过后,将东达八扎杀死,将他妻子强奸。当时的旧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很多群从因遭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1958年8月,就有70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宣称:“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西藏的武装叛乱,从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美国



人诺曼·C·霍尔著《美国、西藏和中国》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六名青年,送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1975年9月5日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一文记述:1958年5月,首批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不久,美国即在哲古地区空投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分子,计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近4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分子。

在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下,叛乱活动迅速蔓延。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经精心策划而挑起的。

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人。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西藏军区方面为此作了认真周到的接待准备工作。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又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分子当场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

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加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他们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达赖喇嘛三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摄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但是,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人民解放军在平叛过程中军纪严明,得到广大僧俗人士的衷心拥护。他们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联防队、保畜队等自卫性组织,为平叛大军修路、



运输、送信、引路、烧茶送水、站岗放哨、救治伤员,使叛乱分子陷于孤立。

三、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亩(15亩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亩土地。

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男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

率为 30%，借粮为 20% 或 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 20%，借粮为 20% 或 25%。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

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

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四、人民获得了人身自由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从而为西藏人民争取平等的人身权利带来了希望。1959 年叛乱平息后，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愿望，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的权利。这是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旧西藏的法典被废除,人不再分为三等九级,各种野蛮刑罚被禁止,私设的监狱被全部拆除。新中国宪法和法律,保障了西藏人民人人享有生命与人身安全的权利。

民主改革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占有的耕地无偿分给了无地的农奴和奴隶。山南乃东县凯松溪卡的443位农民分得了1696克土地。当旧的地契、债约被扔进火堆时,昔日的农奴们围着火堆跳起舞蹈。75岁的索朗说:“过去种主人的地,白天黑夜都成了人家的人,半夜叫支差不敢等到天明,现在分地给我,真觉得睡觉香、吃饭甜,真想多活几年,看看今后的好日子。”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克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由国家支付赎买金4500多万元。

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区粮食产量1960年即比1959年增长了12.6%,牲畜存栏数增长了10%。西藏人民开始得到争取温饱的生存权利。

五、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宪法,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权利。

西藏自治区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西藏人民为获得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而政治热情高涨,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六、国家对西藏发展的特殊支持

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全区平均海

拔高度在 4000 米以上,空气稀薄,低温缺氧,气压和含氧量都不及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气温在 10 摄氏度以上的时间还不及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的一半,可耕地仅占总面积的 0.2%至 0.3%。高原气候和地理环境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对西藏倾注了巨大的关心,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特殊照顾。

国家先后在西藏实行了一系列比内地优惠得多的经济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增强西藏经济的内部活力,加快了西藏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

——财政收入:1988 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打破“零”的记录,到去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23.14 亿元。

——医疗卫生方面: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 1959 年民主改革前的 35.5 岁提高到 67 岁;孕产妇死亡率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5000/10 万降低到 2006 年的 247.49/10 万。西藏目前共有卫生机构 1343 个,卫生技术人员 9095 人,其中执业医师 4270 人。每千人病床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到了 2064 个和 3.20 人。西藏所有农牧民已参加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合作医疗。

——人口和社会保障:旧西藏人口增长缓慢,广大老百姓基本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在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 200 多年间,人口长期徘徊在 100 万人左右。1953 年西藏地方政府申报的西藏人口为 100 万人,200 年间仅增约 5.8 万人。根据最新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7 年末全区总人口为 284.15 万人,比上年净增加 3.15 万人;藏族人口总数比西藏自治区成立前翻了一番;目前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城镇人数达到 33 万多人。

——教育方面: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 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 95%。目前,全区 73 个县已全面完成“普六”,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63 个县达到国家“两基”验收标准,“普九”人口覆盖率达 90.2%,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高;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98.2%、90.7%、42.96%和17.4%,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4.76%。

——社会生活:旧西藏地方政府统计,1950年的西藏约90%的人口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如今,除少数牧区外,西藏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旨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于2006年起西藏开始实施的农牧民安居工程已让11.4万户、57万多农牧民迁入新居。去年,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788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1131元。根据2006年的统计,西藏民用汽车保有量达14.39万辆,比上年末增长35.2%,按当时总人口281万人计算,西藏每20人就拥有1辆私车。

——经济和社会发展:旧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农业发展缓慢。2007年,西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171.77千公顷,比上年增加0.11千公顷;全年工业实现增加值25.71亿元,比上年增长17.1%。去年,共接待游客40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60%,实现旅游总收入48亿元,增长73.3%,相当于全区GDP的14.2%,比上年增长了4.6个百分点。

——交通、邮电、通信: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去年西藏公路总通车里程48611公里,比上年增加3798公里。旧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通讯,去年年末西藏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44.29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5.52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52部/百人。

——民主权利: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了西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成为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据西藏自治区组织、人事部门统计,截止到2006年底,西藏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62211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9.36%;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32987人,占全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74.39%。

——文化方面：国家已累计投入7亿多元用于西藏的文物保护工程，维修开放了14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2008年，还将投入5.7亿元对22处文物古建筑进行维修。目前全区拥有各类文化艺术工作者4000余人，其中藏族占90%以上，大批艺术新秀脱颖而出。

西藏的现实充分说明，西藏人民摆脱封建农奴制后，获得了空前未有广泛的人权。当然，由于西藏的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以及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西藏人民享有的人权还是不充分的，还需要不断做出艰巨的努力，来改善人权的状况，这正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全力进行的。但是，无论从人权的哪个方面来说，现在的状况与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相比，都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过去封建农奴主剥夺藏族人民一切人权的黑暗、野蛮、残酷丝毫不加谴责，却不顾谎言一再被揭穿，四处散布翻身作了国家主人的藏族人民丧失了人权。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以达到梦寐以求的分裂中国、攫取西藏，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实质在此。

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不能得逞的。西藏人民和中国其他各族人民的紧密相联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西藏地区和中国各省区统一为一个国家也已有七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始终没有分裂，而是关系日益密切，这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和分裂关系着藏族、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的兴衰成败，合则共荣，分则两伤。西藏与中国其他部分始终结为一体，而不分裂，这是长时期历史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因此，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汉族和其他民族决不会答应，藏族人民也决不会答应。



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简介

1.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博物馆始建于1954年8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地志博物馆。1992年10月落成的新馆坐落于济南市风景秀丽的千佛山北麓,占地50亩,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是全省文物收藏中心,共收藏各类历史文物、自然标本21万件,约占全省藏品的四分之一,其中一级藏品1500多件。历史文物以陶器、青铜器、甲骨文、陶文、封泥、玺印、简牍、汉画像石、书画、善本书等构成收藏特色。自然标本中有动物、植物、矿物、古生物化石等标本,对研究古地理、古气候、古生态等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山东省博物馆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6月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荣誉称号。

2.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1949年,1968年建成,占地面积32万平方米,系全国和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被中宣部和民政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管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革命烈士纪念塔、济南战役纪念馆、烈士墓地是陵园的主要纪念建筑物。革命烈士纪念塔建在海拔106米的英雄山山麓,塔高34米,塔身南北两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金色大字;烈士墓安葬烈士1548名,其中著名烈士22名;济南战役纪念馆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为该馆题写了馆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也题词勉励,

馆内陈列着王尽美、邓恩铭、刘谦初等烈士以及济南战役中牺牲烈士的部分遗物。

3. 中共山东省党史陈列馆

中共山东省党史陈列馆是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始建于1987年,1991年扩建,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长期举办中共山东省党史展览,展出700多幅照片和300余件革命文物。展览的内容包括党的创立和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党史。在党史陈列馆的北侧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大革命时期中共山东省秘书机关旧址,在省委旧址前面的广场上伫立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塑像。

4.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命名遗址,是中国的考古圣地,1928年,在龙山镇发现了这处遗址。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至今保持着中国考古界的几项“吉尼斯”记录:第一次把地层学的理论引进到田野考古发掘中来;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和刻划符号;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1961年,城子崖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在遗址处建起博物馆。馆内展出龙山镇及附近出土的数百件文物,精品荟萃,展现了九千年前至二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风貌,其中包括西河遗址出土文物、城子崖遗址出土文物和东平陵遗址出土文物。自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建立以来,共接待国内外的参观者20余万人,成为济南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1994年成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 济南解放纪念阁

济南解放纪念阁坐落在济南旧城东南角,是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48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处攻破国民党军队的城防,夺取了济南战役伟大胜利。1965年济南市政府决定在此修建解放阁,陈毅元帅亲自题写了“解放阁”三个大字。



1985年,解放阁重建,高34.1米,采用中国古建筑形式,大屋顶、金黄琉璃瓦。整个建筑分为两层,底层为纪念厅,内设群雕和图片,外墙镶嵌八幅石刻浮雕,展示了军民浴血奋战夺取胜利的壮观场面。二层为观瞻厅,内设革命先烈英雄事迹图片和集声、光、电一体的模型沙盘。台基东、西两侧分别镶嵌着《解放济南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和《纪念济南战役》两块碑文。

6. 济南大明湖公园辛稼轩纪念祠

辛稼轩纪念祠位于大明湖南岸,是为纪念南宋词人,爱国将领辛弃疾而建,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辛弃疾(公元1140—1208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四封闸人,南宋爱国英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生活的年代正是金人占领中原的时期,他力主抗金救国,恢复中原,曾上书南宋朝廷《美芹十论》和《九议》等,22岁时就怀着杀敌报国的强烈愿望,在济南聚集2000多人起义抗击金兵。辛稼轩纪念祠共有三进院落,占地339平方米,展出有辛稼轩生平简介、年表、行迹示意图和各种版本的辛词、评介文章和名人字画及辛稼轩仿铜塑像,陈毅元帅为其题写大门匾额,郭沫若同志也为其题写匾额和楹联。

7.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

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始建于1958年,是国务院确定的512家国家重点企业之一,2001年在全市率先实现销售收入过百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济钢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已发展成集工业、贸易、科研、开发、服务于一体,跨行业、跨国联合,一业为主、多元经营,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8. 山东清河集团

山东清河集团隶属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占地1.6平方公里,居民1700户,4800人。清河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成为闻名全国的“三产第一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清河集团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单位、军民共建、“祖国在我心中”、助残、救灾献爱心等活动,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

主义教育,取得明显效果。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到清河视察工作。清河集团也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以及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9.长清区灵岩寺

灵岩寺地处泰山北麓,长清万德境内。初建于东晋,兴于北魏,盛于唐、宋、金至明。与天台国清寺、南京栖霞寺、江陵玉泉寺并称“四绝”。灵岩寺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寺内文物众多,古迹荟萃。主要文物古迹有千佛殿及殿内享有“海内第一名塑”之誉的四十尊宋代彩塑罗汉、辟支塔、墓塔林等几十处。灵岩寺景区峰峦奇秀,景色壮丽,以其风景幽深,泉石秀丽著称于世。自古至今,灵岩寺以它特有的风姿,非凡的气质,民族的风格,吸引着无数游人,素有“游泰山而不至灵岩,不成游也”之说。1998年5月,灵岩寺荣获“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荣誉称号。

10.济南军区某部“英勇顽强岱崮连”

该连组建于1945年10月,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1947年6月,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外线作战,奉命扼守沂蒙山区的南北岱崮山,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英勇坚守42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被鲁中军区授予“英勇顽强岱崮连”荣誉称号。1964年在军区组织的大比武中,13个项目夺得9个第一,连续6年荣立集体三等功,两次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13次被军区司令部评为“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队式连队”,1次被共青团山东省委表彰为“青少年学雷锋先进集体”,自1982年以来,多次被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和军区司令部评为双拥共建先进单位、共建精神文明先进连队。

11.济南二机床集团

济南二机床集团下设10个生产厂,8个全资子公司,在岗职工4700余人,总资产近12亿元。以机械压力机为主的重型锻压设备和以铣刨床为代表的大型金切机床,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80%以上,并远销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中国“锻压之王、龙门世家”,并被胡锦涛、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称赞为“全国同行业最好的企业之一”、“中国机床行业的佼佼者!”

12. 济南市博物馆

济南市博物馆是山东省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创建于 1958 年 12 月,位于风景秀丽的千佛山下,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米,集收藏保护、科学研究和陈列宣传为一体,是展示齐鲁文化的重要窗口,现收藏各类文物 2 万余件,其中已经国家确认的国宝级和一、二、三级文物逾千件,精品荟萃,蔚为大观。

13. 济南市历下区佛山苑居民小区

佛山苑小区位于泉城广场东南侧,现有 2314 户居民,总人数 7156 人,是国家建设部命名的第二批城市试点小区,在市容卫生、园林绿化、市政道路等城市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住宅小区”、“省级文明示范点”、“省级创建文明社区示范点”、“省级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市级文明示范点”、“市级军民共建先进单位”等荣誉。

14. 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

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坐落在济南乡师原址——今济南明湖中学院内。中共济南乡师支部建于 1929 年 11 月该校创办之初,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共产党地下组织残酷镇压的时期。中共济南乡师支部虽然历经劫难,但始终顽强地进行斗争。1933 年山东党组织与中央失掉联系后,乡师支部独立坚持斗争,为恢复和发展济南及山东党组织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被誉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白色恐怖下的一颗红星”、“白区里的一所红色党校”。

该陈列室建于 1991 年 6 月,为四合院式仿古建筑,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收藏有百余份反映乡师党支部曲折斗争历史的照片和实物,数万名群众曾到此参观、学习,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宋平同志为该室题词。

15. 济南市青少年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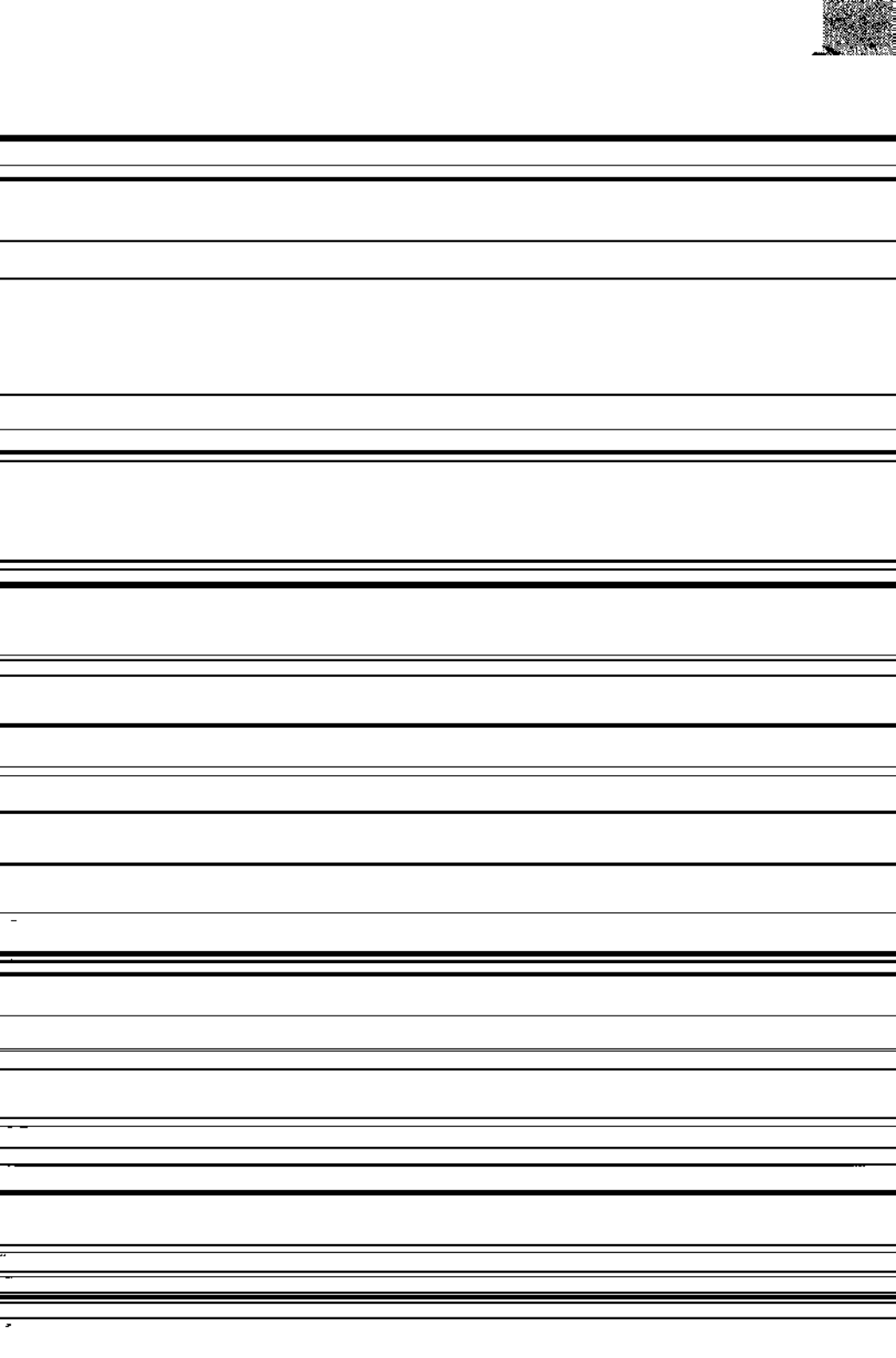
济南市青少年宫位于大明湖畔西侧，占地面积 29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600 平方米。始建于 1964 年，1965 年对外开放。1991 年建立国防宫，设有国防教育展览室、轻兵器陈列室、重兵器陈列场。长期以来，青少年宫充分发挥校外教育阵地和少儿人才摇篮的作用，坚持教育“三个面向”的方针，以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为己任，大力转变教育观念，加大改革力度，为国家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幼苗和专业尖子人才。1990 年被省委授予“少年儿童工作先进单位”，1992 年被团中央、文化部授予“全国先进青少年宫”，自 1991 年以来连续被团省委评为“山东省红旗青少年宫”。

16. “四五”烈士纪念碑

1931 年 4 月 5 日，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等二十二位优秀共产党员在济南市纬八路刑场(现槐荫广场)英勇就义，史称“四五”烈士。1987 年 3 月，在共青团槐荫区委的倡议下，社会各界人士集资，在烈士当年就义的地方，建起了“四五”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位于槐荫广场的西北角。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为“四五”烈士纪念碑题了词。

17. 历城区柳埠四门塔

位于济南市南郊柳埠镇的四门塔，是齐鲁第一寺院——神通寺遗址的组成部分(神通寺遗址内还有龙虎塔、九顶塔等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因塔设有四门，故自宋以来即名四门塔。该塔建于隋大业七年(611 年)，系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巨塔，1961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塔为单层方塔，用当地大块青石所砌，石上全部都刻有几何花纹。塔高 15.04 米，四边各宽 7.4 米，墙厚 0.8 米。塔顶有 23 行石板，层层收缩叠筑，成四角攒尖方锥形，顶端由露盘、山埠、蕉叶、相轮组成塔刹。塔内，有一石砌方形塔心柱，面对半圆形拱门而端坐。四佛皆螺髻、盘膝，有的双手叠于腹前，有的两手抚膝。该塔和神通寺遗址，是重要的佛教游览胜地。



前夕,陵墓建设中断,只建纪念塔和部分墓室。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山东省和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陵园于1983年9月竣工。陵园南北纵向,顺山势建成,内有“山东革命先烈公墓纪念塔”、《烈士陵园重修记略》碑、广场等建筑。陵园中端是墓地,掩埋着辛亥革命中为推翻清王朝及反对袁世凯复辟而牺牲的十几位革命烈士。

23.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

琵琶山“万人坑”在济南市西十里河庄琵琶山下,现济南试验机厂内。1940年,日本侵华北支那方面军所辖第12军和第43军,在琵琶山以南长40米、宽42米的地方修建大小坑8个,用极其惨酷毒辣的手段屠杀我抗日军民。建国后,经初步挖掘检视,仅在8个坑内拣得完整尸骨746具。日寇在琵琶山杀害的我爱国志士和抗日军民远不止这些。1990年10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之际,济南试验机厂全体职工集资兴建了琵琶山“万人坑”纪念碑,以缅怀死难同胞,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24. 济南市档案馆

济南市档案馆成立于1958年,位于济南市建国小经三路37号市委院内,是集中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档案、社会各方面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中心。馆藏档案资料30多万卷(册),其中革命历史档案268卷,民国时期档案14914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250037卷,声像档案及各类资料3万多件(卷)。近年来,档案馆为全市各行各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周到的服务,同时利用档案资源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每年接待社会各方面利用者1万多人次,提供档案资料2万余卷(件)。

25. 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旧址

大峰山地处长清区孝里镇,是齐长城源头。作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清人民革命的摇篮,大峰山被当地群众誉为“长清的延安”。1938年,万晓塘、魏金三等抗日英雄在此开辟了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1938年6月在大峰山下岚峪村建



立了第一届中共长清县委。建国后,大峰山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1979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6. 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楼(侵华日军山东战区签降旧址)

山东省图书馆始建于1908年(清宣统元年),坐落于大明湖畔,是全国建馆最早的省级馆之一,也是全国十大图书馆,馆内藏书500多万册。馆内奎虚书藏楼是闻名全国的藏书楼,年接待读者40万人。楼名“奎虚”,取古天象之说,“奎星主鲁,虚星主齐”,意在涵盖齐鲁之精华。1945年12月27日,山东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在此举行,楼内收藏了许多重要历史实物和珍贵的纪实照片,是山东省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27. “泺口九烈士”纪念碑

1933年8月18日,原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李春亭、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李伟仁、中共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孙善帅、共青团青岛市委书记张福林、中共徐海蚌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中共益都县委书记段亦民、中共益都县委书记郑心亭、中共郯城县委组织委员孙善师、中共青岛市委秘书王常怡九名党员干部,在泺口堤下马家道口英勇就义。2005年4月,济南市委、市政府在烈士牺牲地建立了“泺口九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坐落于黄河岸边风景秀丽的森林公园内,整个纪念碑共由三个部分组成。

28. 中共平阴县委旧址纪念馆

中共平阴县委旧址纪念馆坐落于孔村镇王楼村东南。1939年2月1日,中共平阴县委员会在该村村民王新乾家中成立。20世纪90年代后,历届县委多次组织对县委旧址进行抢救性保护,2006年,平阴县组织对县委旧址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扩建。同时,重新布置了平阴党史展览,规划设置了4个展室,展出图、表、照300余幅,更新了展柜,丰富了展品,配备了管理人员和讲解人员,建成了中共平阴县委旧址纪念馆。

2008 年全市党史工作要点

2008 年,全市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省、市委九次党代会精神,按照中办发〔2006〕23 号文件要求,坚持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为重点,不断推进资料征编、党史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工作,为“维护省城稳定,发展省会经济,建设美丽泉城”做出积极贡献。

一、突出重点,搞好党史研究特别是党史正本编写出版工作

按照中央、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要求,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研究工作,积极做好市级和县(市)区地方党史正本的编写出版,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了解济南党组织的发展历史,提供全面系统的教育读物,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

完成《中共济南地方史》(1949.10~1978.12)初稿。根据市委审定通过的《中共济南地方史》(1949.10~1978.12)编写提纲,在完成 30 个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的基础上,积极补充查阅档案、图书、报刊,征集整理口述史资料,修改完善专题目录,继续做好专题研究工作,确保年内完成初稿。

启动《中共济南地方史》(1979.1~)编写工作。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济南地方党史的编写工作,做好查阅档案、走访老同志,收集和整理资料工作,着手起草编写提纲。有条件的县(市)区也要适时启动中共地方史(1979.1~)的编写工作。

出版发行《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1993.1~2005.12)。经过多



次修改、补充,2008年初确保出版发行。

做好《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2006.1~)续编工作。坚持当年大事当年记,分年度做好2006年以后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收集整理工作,为续编《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

启动《济南中共党史人物》(三)征编工作。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启动《济南中共党史人物》第三卷(1998~2008)征编工作。

编辑出版《社会主义时期中共济南地方史专题资料》。以已完成的30个专题和列入全市2006~2010年党史工作规划的20个专题为主要内容,2008年起将陆续结集出版。

完成《中共山东年鉴》(2008卷)组稿工作。按照省、市委要求,完成《中共山东年鉴》(2008卷)济南部分18篇稿件的组稿、编辑和上报工作。各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也要积极做好《中共山东年鉴》组稿有关工作。

编辑出版《济南党史研究》。继续办好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党史学会的机关刊物《济南党史研究》,完成两辑出版任务。

做好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口述史的征集工作。要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加强对有关重要党史人物口述资料的征集工作。

开展资政专题研究。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济南解放60周年等课题开展资政专题研究,全面提高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水平。

二、注重实效,提高党史宣传教育水平

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充分利用重大节庆资源,搞好相关重大纪念活动,拓展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思路。要利用多种载体把济南丰富的党史资源转化为可读、可看、可听的鲜活资料,努力扩大党史宣传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党史宣传教育水平。

做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

做好庆祝济南解放60周年系列活动。积极承办有关图片展

览、纪念会议、辉煌 60 年知识竞赛,在新闻媒体开辟纪念济南解放 60 周年专栏。

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场馆的保护利用工作。加强对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地、纪念场馆的保护利用,做好对红色旅游的指导。加强对山东省党史陈列馆、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解放阁及其他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地的指导与协调,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作用。筹建“中共济南市委旧址纪念馆”,积极做好纪念馆的规划、选址,启动资料征集整理、布展大纲撰写等前期准备工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结合小清河改造工程,筹建五柳闸市委重建旧址纪念亭。

办好“济南中共党史”网站。在全新改版和增设栏目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网站内容,增加网站的信息量。做好与其他地方党史网站联网工作,实现资源共享。有条件的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也要开办有地方特色的党史网站。

筹备“中共济南地方史展览”。做好展览大纲的修订、完善工作,适时举办展览。

搞好其他纪念活动。做好纪念王尽美同志诞辰 110 周年、“济南惨案”80 周年有关纪念活动。

三、全面推进,加强党史机构队伍建设

根据中办发〔2006〕23 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明确党史部门的性质和党史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任务、基本要求,全面加强党史部门机关建设和队伍建设。

积极争取党委领导。主动向党委分管领导汇报党史工作,积极争取党委领导。适时召开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传达全国、全省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精神,表彰先进,总结工作,安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党史工作。

强化培训,不断提高党史队伍整体素质。积极倡导学习之风、研究问题之风,鼓励学政治、学理论、学业务。举办两次全市党史工作专题研讨班。组织业务骨干参加中央和省举办的培训班,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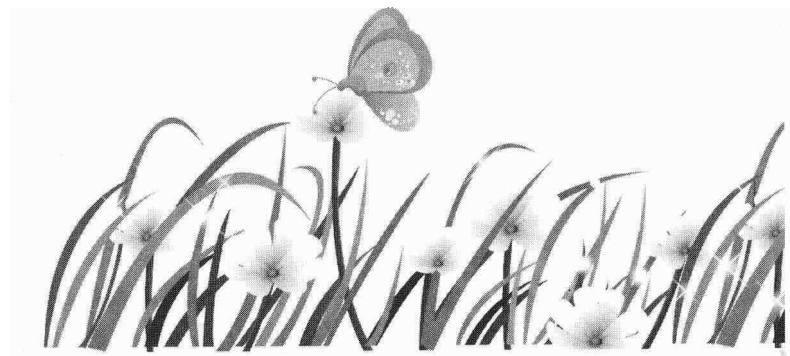


织全市党史工作骨干外出学习考察,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

不断改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完善分工包点制度,把党史正本编写和资政课题研究作为指导重点,强化对重点任务和重大课题的指导和组织协调,加强对各县(市)区党史部门的业务指导、工作协调、督促检查。

加强党史资料、图书的管理。按照“便于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进行整理编号,建立电子目录,做好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提高管理、利用效率。

整合社会力量开门办史。主动争取老领导、老同志和有关专家学者对党史工作的关心支持,充分调动社会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开门办史,形成合力。紧密结合地方党史工作实际,充分发挥党史学会的作用,组织市党史学会成员加强对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的研究。各县(市)区要抓紧建立党史研究会。



党史开新面 资政书新篇

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党史委

2006年以来,历城区党史委在省、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历城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各项工作都取得新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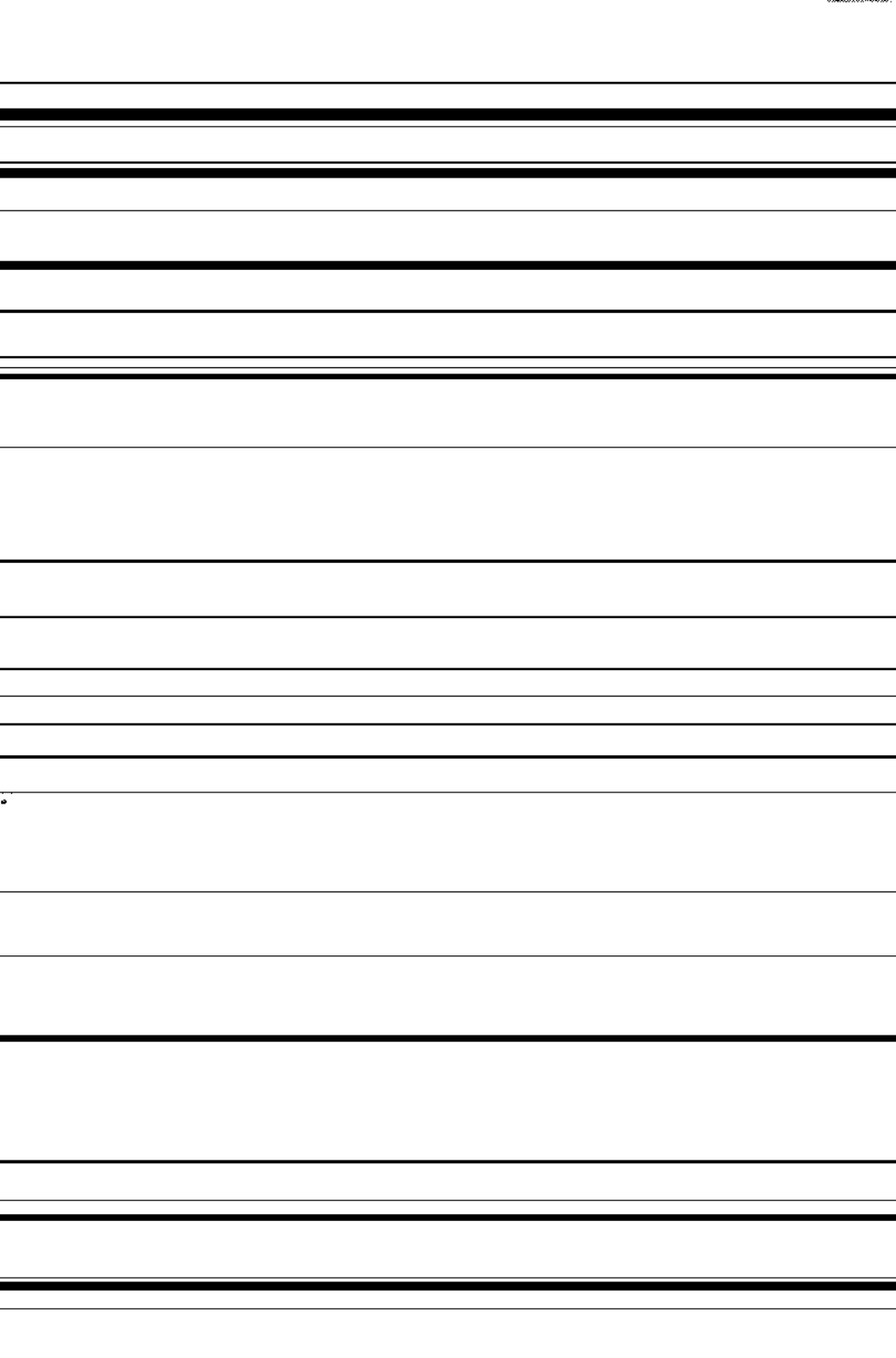
一、认真加强队伍建设

一是充实力量。针对党史部门普遍存在的队伍老化现状,经过积极争取,先后选拔两名年富力强、专业对口的年轻同志充实到队伍中来,其中一名是应届毕业、公开考取的大学生。优化了队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为党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加强学习。紧密结合党史工作实际,努力创建学习型机关。严格遵守《学习制度》,坚持每周的集体学习,为每位同志配备了专门的学习记录本,将学习内容及体会记在笔记本上,支部每季度检查一次,对每个人的学习笔记进行点评,提高了大家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分析理解能力。

三是强化管理。进一步修订完善了《上下班制度》、《办公纪律》、《卫生制度》、《廉洁勤政制度》等各项制度;并强化措施,保证落实。每位同志都能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照章办事。

四是锤炼作风。继续发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和“创一流业绩”的精神,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领导与职工、主要领导与副职之间都能做到换位思考,领导为大家着想,大家替领导着想,形成了团结一心、不计得失、勤奋工作、争先创优的良好风气。



70 岁以上老人走访率达 96.2%。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抗战时期历城辖区内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积累了进行重大历史事件调查的工作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党史特别是抗战史的研究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是编写发行《历城革命斗争史话》。按照市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安排,党史委组织人员编写了《历城革命斗争史话》一书。该书以历城党组织活动为主线,生动翔实地记录了历城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所创立的不朽业绩,对于宣传历城革命斗争历史,弘扬革命传统,促进全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是撰写完成《走向富裕民主文明的王舍人镇》一书。该书以王舍人镇五十年发展历程为主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城区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目前,全书的编审工作已经完成,计划明年出版发行。

(二) 党史宣传有了新突破

一是编写发行《青少年教育读本——革命传统教育篇》。党史委发挥党史工作的育人职能,与区关工委密切配合,组织人员编写发行了《青少年教育读本——革命传统教育篇》一书。该书以真实的历史为题材,运用简洁朴实的语言,精心选编了有较大影响和重要情节的 31 篇人物故事和革命纪念地介绍。真实再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历城留下的光辉足迹,记述了当年战斗在历城的革命老前辈和先烈们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舍生忘死、机智灵活、浴血疆场的革命史实。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一部好教材。

二是抓好开门办史。与区关工委、团委、教育局等单位密切合作,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新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开展了“党史进校园”活动,先后举办了尹天佑烈士事迹、田庄惨案、“抗日模范村”——南高而村等党史报告会 30 余场次。在新闻媒体先后发表了一批专题文章,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好素材。积极参加市党史学会组织的论文评选,并有多篇获奖。



三是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围绕全区的工作大局,积极撰写资政文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按照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区政府有关领导的要求,对全区的革命遗址及文物进行了普查,取得了大量的文献和图片资料。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关于筹建中共济南市委旧址纪念馆的建议》、《关于开展红色旅游的建议》等多篇调研报告,引起了市、区领导的重视,有的已列入议事日程。

(三)征编工作有了新进展

一是保质保量地为省党史研究室撰写了《历城的“四清”运动》等专题文章,为泰安市和东营市党史研究室征集编写了一批党史资料,并受到一致好评。

二是根据省、市党史研究室的要求,重点加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认真开展党史二卷的征编工作。积极做好基础性工作,明确了有关要求,加强了人员培训,查阅、征集了一批档案、图书和报刊资料。目前已经拟定好提纲,初稿的编写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

三、出色完成上级交办任务

一是出色完成省党史研究室部署的《中共山东年鉴》(2005、2006卷)历城部分的撰写任务,从组织概况、基层建设、重要工作与成绩、创新与经验等方面,宣传了区委、区政府的好经验、好做法,并推出了遥墙镇和仲宫镇艾家村等先进典型。较好完成党史书籍刊物的征订发行任务。

二是圆满完成区委部署的部门包村任务。将包村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贯彻区委关于创建“文明生态村”的决定,明确了包村工作的重点。经常与村书记及村两委成员沟通思想,加强联系。克服单位人员少、经费紧等困难,想方设法筹集资金3万余元,为村里新修了水泥路。投资5000多元为村里购置书橱和图书,建立了图书室。在党员中开展了联户帮贫活动,认真解决关系该村经济发展和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多办实事,使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法， 推动平阴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

中共平阴县委党史委

2006年以来，平阴县委党史委在省、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关心指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资政、存史、育人”根本任务，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拓宽工作领域，探索党史工作新方法、新途径，在党史宣传教育、党史正本编写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2007年5月，我县在全省党史宣教工作研讨班上作了典型发言，介绍了平阴县开展党史宣教工作的经验。12月，被评为“2006—2007年度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

一、工作开展情况

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上级要求，积极寻求工作创新，纪念馆、网站、电视片、专栏等多措并举，党史宣教工作扎实有效，在地方史编写、开门办史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整个党史工作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一)搭建平台，创新方式，党史宣教工作成效显著。充分发挥党史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党史宣教工作的新形式、新方法，特别是2006年以来围绕庆祝建党85周年，集中开展了党史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党史宣教工作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一是以县委旧址建设为平台，夯实党史宣传教育的阵地。把县委旧址作为党史宣教的主阵地进行建设，由我们牵头组织对县委旧址进行了改扩建，规划设置了四个展室，设计制作了中共平阴党史展览，新做展板60余块，展出各类示意图、表、照等300余幅，文字1万余字，更新了展柜，增加了展品，培训了



讲解人员,建成了中共平阴县委旧址纪念馆,被命名为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七一”前夕正式开馆,县委书记孙积港同志率领县委班子成员参加了首展式,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各党委、各部门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青少年学生等前往实地参观。纪念馆开馆以来,接待参观人员2万多人次,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以平阴党史网建设为窗口,拓展党史宣传教育空间。2006年6月在济南市各县(市)区中第一个建立开通了党史网站。网站共设工作动态、征研成果、资料汇编等10个一级板块,收录文字资料近百万字,照片90余幅。党史网站的建成,能够第一时间将党史研究的成果、党史工作的信息发布到互联网,方便了社会各界对党史资料的查阅利用,成为全县党史宣教的又一重要窗口。

三是以报纸、影视为载体,丰富党史宣传教育的方式。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在平阴公众信息开设纪念建党85周年《永远的丰碑》党史人物专栏,每期介绍一名党史人物的英雄事迹。为更加直观形象地宣传平阴的革命历史,我们与县委组织部电教中心联合,拍摄制作了党史宣传教育电视片《红色记忆——平阴县革命斗争史记》,全片长60分钟,分抗日烽火和解放壮歌两个部分,通过观看此片,在短时间内就能了解平阴人民在党领导下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历史。为充分发挥该片作用,制作了1000套该片VCD光盘免费下发到全县各基层党组织观看,同时在平阴电视台新闻栏目开设专栏,分13次播出了该片,取得了较好宣传效果。

四是以党史重要事件、活动为契机,提高党史宣传教育的实效。为庆祝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与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迎接党的十七大党史县情知识竞赛。此次竞赛活动,共收到有效答卷2557份,在干部群众中进行了一次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二)精心组织,措施得力,党史正本编写进展顺利。将《中共平阴地方史》(二卷)编写作为全县2007年度党史工作的中心任务来

抓,结合平阴实际,制定了编写方案,选聘精干人员开展工作,整个编写工作进展顺利。一是学习外地经验,强化业务培训。先后从胶南市、莱芜市购买、交流了部分专题资料以及地方史二卷等书籍,组织到历下区、东平县、肥城市等地学习先进经验,选派5名同志参加了全市地方史二卷编写培训班,提高业务能力。二是与县委老干部局联合在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文活动。以有奖征文的形式,征集到了部分亲历过这一历史时期的老干部的回忆文章和文献资料。三是撰写初稿、责任到人。在党史委现有4名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又聘请了3名熟悉党史业务的同志帮助工作,组成编写组。编写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全书编写任务按时期分解落实到人,规定质量标准和完成时间,定期督查调度。目前,已完成初稿撰写任务。围绕二卷编写,我们先后查阅各类档案资料500余卷(册),形成初稿25万字。

(三)主动衔接,严格执行,上级任务要求落实全面。对于省、市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主动做好对接,积极接受指导,严格落实要求,不折不扣地完成。精心组织开展了全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工作。抗战课题任务部署以后,我们积极组织协调,认真完成了动员部署、骨干培训、调查走访、督导调度、查阅档案、汇总分析、撰写调研报告等工作,创造性地设计了县直部门、乡镇、村三级调研统计表,构建了纵到县直部门、乡镇(办事处)、行政村(居),横到每个70岁以上老人所在家庭的调研格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调研模式,确保了调研走访率和走访质量,并且接受了省抗战课题工作办公室的督导检查。积极配合市委党史研究室完成了济南革命历史文化丛书平阴卷的修改、定稿工作。将《中共山东年鉴》组稿、《世纪潮汐》订阅、组织党史会员撰写论文等工作列入每年常规工作任务,做到早动手、早安排,及时进行资料征集、编辑,按时完成组稿、订阅等工作任务。

二、主要做法与体会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坚持从实



际出发,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推动了党史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积极争取领导重视是做好党史工作的前提。开展党史工作,举办党史活动,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需要人、财、物等作保障,需要组织协调全社会的力量。在工作中,我们自找活干,“自讨苦吃”,抓住一切时机向领导汇报党史工作情况,通过积极有为的工作,主动争取领导对党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县委书记孙积港同志多次到县委旧址实地察看,现场办公,解决困难,先后协调资金7万元用于县委旧址修缮和纪念馆建设。2007年县委决定每年从党费中列支6000元,作为县委旧址日常管理费用,实现了县委旧址管理工作的正常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作为分管党史工作的领导,经常听取党史工作汇报,切实从人、财、物等方面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先后为《红色记忆》电视片光盘制作、党史二卷编写协调资金6万元,为党史委协调增加人员编制3人,从其他部门借调了2名素质较高的工作人员到党史委帮助工作,为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二)开门办史、搞好“结合”是做好党史工作的捷径。党史工作与党的组织、宣传、文化、档案等部门联系密切。实践证明,加强与这些部门的“结合”,借水行舟、借台唱戏,是做好党史工作、发挥党史职能作用的有效方法。我们围绕庆祝建党85周年开展的四项宣教活动,都是在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如县委旧址纪念馆建设,我们党史部门负责牵头抓总、整体策划,具体负责完成了党史展览设计、制作和实物布展,而县委旧址改造的基建、经费筹集、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等工作,分别协调孔村镇党委、县委组织部和县委宣传部等部门来共同完成。《红色记忆——平阴县革命斗争史记》宣传片的拍摄制作,我们仅完成了电视片脚本撰写、资料图片准备、安排采访等,摄像、编辑、配音、合成等大量工作均由县委组织部电教中心无偿提供技术支持。《永远的丰碑》人物专栏由我们提供资料,由县新闻中心负责刊

登。举办迎接党的十七大党史知识竞赛,由我们负责竞赛试题、组织抽奖,由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部署发动,网通公司提供了奖品。县电视台对这些工作的开展及时进行了跟踪报道,扩大了社会影响。以上工作的开展,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涉及的范围,以及由此带来的资金支出单靠党史部门自己显然无法承担。通过与这些部门“结合”,改变了以往党史部门闭门工作、单打独斗的传统做法,借助了其他部门的力量,整合了社会资源,弥补了党史部门在经费、技术和社会关系上的不足,形成了做好党史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与时俱进、坚持创新是做好党史工作的关键。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运作方式、活动内容等方面树立现代意识,结合服务对象的特点、需求,不断拓展党史工作领域,丰富党史工作载体,做到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报纸有文章、网上有信息、刊物有交流。中共平阴党史网站开通后,点击率保持快速增长,点击数量接近2万人次。《红色记忆——平阴县革命斗争史记》党史宣传片在平阴电视台新闻栏目中的连续播出以及迎接党的十七大党史知识竞赛的举办,均在全县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家普遍认为,这两个活动给自己上了生动的一课,感慨自己虽然生在平阴、长在平阴、工作在平阴,但是自己却对平阴的历史了解不多,对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知之甚少。有参赛者在答题的同时,写上了参赛感言:“我们细读党史、县情,深觉平阴人杰地灵,平阴人对革命建设有贡献!”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认识到,提升党史工作水平,既要踏准时代节拍,又要注重形式上的创新,党史工作才能始终充满活力。

(四)管理规范,团结和谐是做好党史工作的保障。近年来,我们始终把加强队伍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抓学习、抓整顿、抓形象、抓提高,狠抓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和机关管理规范化建设,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增强工作



能力,造就了一支团结协作、爱岗敬业的工作团队。全体同志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讲大局、讲奉献,爱岗敬业、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埋头苦干,耐得住清苦、辛苦、艰苦,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赢得了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2007年全县领导干部调整,县委党史委1名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提拔为主任,1名中层干部提拔为副主任,一个单位两名同志同时得到提拔,在全县各部门中也是不多见的,引起了强烈反响,单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得到了提升和加强。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平阴党史工作正逐步形成领导重视、部门支持、社会关注、群众欢迎的良性循环局面。



市委党史研究室光荣榜

- ★ 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 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 ★ 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 张凯军 赵百世 廉胜杰
- ★ 全省党史系统先进个人： 张成芳 张凯军 李作顺
- ★ 全市党史系统先进个人： 王 音 李金凤 郭 梅

★ 优秀成果

《济南革命历史丛书》全国党史系统二等奖
全省党史系统一等奖
济南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 全省党史系统优秀成果

一等奖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论文) 岳绍红
《五三祭》 刘春明

二等奖

《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1993-2005)
“弘扬济南精神 建设和谐泉城”摄影作品大型展览活动
三等奖

《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三件大事》(论文) 闫以功
《弘扬济南精神 建设和谐泉城摄影展览获奖作品选》

★ “精品工程”奖

《五三祭》(刘春明) 山东省、济南市“精品工程”奖
《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闫以功) 济南市“精品工程”奖



2007年10月以来党史工作信息

中共济南党史网站全新改版。2007年10月,中共党史网站(www.jnzhgds.gov.cn)升级改版全面完成。改版后的济南党史网内容更加丰富,地方特色更加鲜明,网络技术更加成熟,更加有利于学习阅读和使用。

《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出版发行。2007年10月,由市委党史研究室与有关部门联合编辑的《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第二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真实再现了当年在罗荣桓元帅领导下的山东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讴歌了罗荣桓元帅在山东创下的丰功伟绩。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召开,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收看电视直播。室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机关各处多次组织集体学习,领导干部参加市里组织的读书班。10月29日下发《关于在全市党史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通知》。

开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根据市委要求,开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2007年11月15日召开主任办公会,传达学习市委要求和实施方案,成立本室活动领导小组。11月17日,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和配档表,以文件形式印发。11月20日召开动员大会,重点围绕坚持科学理念,树立一流标准、破除陈规陋习、推进提速提效,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

《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1993.01~2005.12)出版印刷。2007年年底,经过多次修改、补充,经审定后交付印刷。该书荣获全省

党史系统 2006~2007 年度优秀成果二等奖。

市委党史研究室被评为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2007 年 12 月,市委党史研究室被评为全省党史系统 2006~2007 年度先进集体。

《济南革命历史丛书》荣获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07 年 12 月,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济南革命历史丛书》(2006 年出版)荣获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该奖项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也是济南市党史部门成立以来党史成果获得的最高荣誉。该书荣获全省党史系统 2006~2007 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济南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认真学习贯彻李建国、焉荣竹同志重要讲话精神。2008 年 1 月,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门召开主任办公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省委书记李建国同志在考察济南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时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焉荣竹同志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市委的要求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不断推出存史资政育人的新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全市工作大局。一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研究工作,积极做好市级和县(市)区地方党史正本的编写出版,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了解济南党组织的发展历史,提供全面系统的教育读物,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二是围绕全市工作大局,拓展党史宣传教育工作思路,充分利用重大节庆资源,搞好相关重大纪念活动,保护、建设好市委旧址等革命历史遗址、纪念地,发挥好现有党史宣传教育阵地的作用。要利用多种载体把济南丰富的党史资源转化为可读、可看、可听的鲜活资料,努力扩大党史宣传教育覆盖面,不断提升党史宣传教育水平。

市委党史研究室认真落实徐学武同志批示精神。2008 年 1 月 11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学武同志专门听取全市党史工



作汇报。学武同志对今年全市党史工作安排表示满意,并对做好党史服务现实、服务全市工作大局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批示:“对当前全市的工作,可以从党史的角度,注意分析总结,以利今后资料的整理。”为贯彻落实学武同志批示精神,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主任办公会进行了认真研究。会议要求,第一,2008年全市党史工作要点以正式文件尽快印发。第二,领导班子成员针对学武同志的批示精神,从各自分管工作的角度,对全市的工作进行思考,注意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要强化资政意识,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的根本任务来开展。第三,认真总结2007年工作,既总结成绩,也总结经验做法,尽快呈报市委分管领导和省委党史研究室。

市委党史研究室被评为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多项成果荣获全国、省、市奖项。两年来,全市党史系统全面开展党史资料征编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和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市委党史研究室、历城区委党史委、平阴县委党史委、长清区委党史研究室、章丘市委党史委被评为2006~2007年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体。

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部分机关干部赴湖南学习考察。2008年3月底,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部分机关干部赴湖南学习考察。与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进行了工作交流,参观了当地经济社会城市建设大型展览。还参观了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毛泽东纪念馆,瞻仰了毛主席铜像并敬献花篮;参观了刘少奇同志故居、纪念馆和铜像;参观了纪念长沙三次抗日大会战中阵亡将士的崇烈门。通过学习考察,接受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观摩了湖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历史遗址、旧址建设的先进经验。

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召开。2008年4月14日,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槐荫区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去年以来全市党史工作,表彰了先进集体和个人,研究部署了今后一段时期工作。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岳绍红同志主持会议并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要强化大局意识。党史工作在市委中心工作的大背景下展开,党史资料征编、党史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维护省城稳定,发展省会经济,建设美丽泉城”这个大局和中心来进行。二是要强化责任意识。党史工作是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从事了这项工作就有责任扎实地做好,多出成果,多出精品。三是要善于抓住工作重点。当前市县两级党史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编写出版中共地方党史(1949—1978),同时统筹兼顾组织史、大事记及其他党史读物的编写出版工作。党史宣传教育要积极配合全市的重要纪念活动,转化研究成果,更好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四是要在保护革命历史遗迹遗址方面有积极的作为。当前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众多革命历史遗迹遗址需要保护。党史部门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在革命历史遗迹遗址保护方面有所作为,或建馆立碑,或维护修葺。确实不能保留的,要及时录相拍照,做好资料留存整理工作。

《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1993~2005)首发式举行。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济南历史大事记》(1993.1~2005.12)近日出版发行。在4月14日召开的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举行了首发式。

孙晓刚同志作出关于保护和修复王尽美同志旧居的批示。2008年4月16日,市委常委、秘书长孙晓刚同志看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呈阅的《党史工作信息》后,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把有关单位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把事情妥善做好。2008年4月10日,市委党史研究室致函市园林局,商榷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同志旧居修复问题。市园林局主要领导十分重视,及时作出批示,责成有关处室落实。

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亭筹建工作进展顺利。2008年4月22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小清河开发建设投融资管理中心就“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亭”筹建工作召开联席会议。市委党史研究室主要负责同志阐述了中共济南市委重建的历史背景和



重大意义,对纪念亭和纪念碑的整体设计思路提出了建议。市小清河开发建设投融资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就纪念亭的选址,纪念亭、纪念碑的设计和意义讲了意见,并表示将全力以赴,保证质量、保证经费把这件事情办好,使其成为对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同志到县(市)区调研督查。2008年4月下旬至5月初,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同志分赴各县(市)区调研,检查贯彻落实全市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的情况,重点是检查督促地方党史(1949~1978)的征编出版工作,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意见和具体要求。

